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317期

## 【思想文化】

李讷的精神不正常与“红二代”家庭的短板

——文革随想录之三/老方

## 【百年国史】

国共最后的一战——所谓“解放大陈岛”/刘翠香

画说我的一生（21）

——向阳湖上五七宝（1969-1974）/刘海鸥

## 【评论】

季羨林为什么造反/班道超

## 【怀人】

我的干妈包静安/张保和(美)

## 【口述】

历史所三十年（上）

——《上班记》选载（二）/何兆武 口述，文靖 执笔

吴忠杂忆/陈楚三、李大震整理

1. 李讷和李敏 2. “四人帮”和谢静宜

3. “四五”事件中的《应急方案》 4. 公安部长李震之死

## 【述往】

文革后期的“小解冻”/马昌海

## 【文革轶事】

“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朱成昭如是说

## 【文摘】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严家祺

##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 李讷的精神不正常与“红二代”家庭的短板

——文革随想录之三

老方

聂元梓判决书上的第一个罪名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证据是1966年11月受江青的密谋指示，到上海煽风点火，搞反革命串联。聂元梓向法庭大叫冤枉：上海是毛主席派我去的！1967年11月，毛主席派李讷两次来北大找我，要我去上海。李讷可以做证。

法庭说，李讷否认她曾经受其父之托，找过聂元梓。而且告诉聂元梓，李讷拒绝出庭做证。聂元梓没辙了，只好把当年李讷找她的事一五一十写出来，大白天下，以伸己冤。聂元梓先后在香港出过两本回忆录，都在官方禁书之内。

我以前认为，李讷否认事实，拒绝出庭，是她要跟党保持一致——抛出她老妈，保住她老爸。看了吴忠的口述，我才意识到，事情不这么简单。请看吴忠是怎么说李讷的——

（1968年）有一次她带杨秘书到市委门口，看到市委、市革委会的牌子，骂“修正主义”“反革命”。据门口说，也骂江青，骂完了就走了。后来开会她来，看来还正常啊！但很多表现精神不正常。

毛主席病重、病危时，据了解李讷没去看过；毛主席逝世后，守灵她也没去，我们都参加守灵了，江青也守灵了，女儿为什么不去？抓“四人帮”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同志到玉泉山，我问吴德，李讷到哪去了？吴德说就在玉泉山住，每天在这儿玩，没事。江青被抓起来了，李讷也没有表现出痛苦。我想这不是正常人的情况，可能是病态。毛主席的追悼会也没参加，按道理是反常的；江青抓了，也没什么反应，我看是病态。（陈楚三、李大震整理：《吴忠将军口述》页114-115，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

“病态”“反常”“精神不正常”，说到底就是精神病。李讷为什么会得精神病？这和她找的对象有直接关系，李讷找的对象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徐先生，此人高中文化，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出身好，人精明能干，政治可靠。毛的态度是，婚姻自主，父母不宜干涉。江青的态度是，两个家庭情况相差甚远，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相差甚远。总之不般配。

本来就想开掉这个上门女婿的江青，发现他的笔记本上记有若干电话号码，于是，江青就怀疑他是特务。遂以学习的名义将其发配到石家庄铁路学院。“目的是要把李讷和她的丈夫分居两地，淡化他们之间的感情，为他们俩离婚做准备。”

“李讷与其丈夫新婚燕尔，要把他从李讷身边弄走，李讷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李讷是一位倔强的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李讷长期神经衰弱，无法入睡，江青又禁止给她安眠药。1972年的三四月间，怀孕七八个月李讷，凌晨三点跑到钓鱼台，硬闯江青的房间，母女大吵并对骂，母亲骂女儿泼妇，女儿骂母亲心太狠。江青怒斥李讷“滚”，并命令秘书警卫把李讷架出房间。李讷被架上了汽车，汽车刚驶出钓鱼台，李讷跳下车，坐在马路沿上不走，不给她安眠药，她就外面这么冻着。那时候正是春寒料峭时节，杨银禄担心出事，赶紧给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张顶着雷让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这才上车，回中南海。

第二天一早，江青起床洗漱，淡定如常，对李讷的事不闻不问，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时的毛泽东正在忙着两件事，一是“九一三”的善后，二是尼克松访华。他早就把女儿的生活、身体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72年5月，李讷生了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秘书向江青报喜。江青面无表情地发表了一番旷世高论：

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对我叫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不管叫姥爷、外公，还是爷爷，毛泽东既没有理睬自己的女儿，也没有理睬自己的外孙。至少在毛泽东年谱上没有这样的记载。当了妈妈的李讷，精神好了几个月，很快又崩溃了，不用说照看孩子，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个最初叫徐小宁，后改名王效芝的男孩，由警卫班的战士们带大。

李讷领教的是权力的残忍，体会不到一点人间温暖，她的心灵在痛苦之中纠结，她的神智在孤独之中变形，保持精神正常，会让她更难过，得精神病是她唯一的解脱。

这就是中国的第一家庭，一个没有爱，没有情，只有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的家庭。在这个家庭的男主人眼里，妻子是从文艺口进入政治局，为他冲锋陷阵的战车；女儿是了解高校动态，向造反派头头发号施令的手机。在这个家庭的女主人眼里，老公是自己实现政治野心的梯子；女儿是自己控制更多权力的机械臂。<sup>1</sup> 如果评选本世纪中国最倒霉的女儿、最恶毒凶狠的母亲和最不负责任的父亲，李讷和她的父母应该榜上有名。

从李讷想到了“红二代”，从毛江想到“红二代”的家庭教育。在我看来，大多数的“红二代”的家庭教育存在着两个短板——

第一，亲情薄。革干和军干，尤其是从学生走向革命后来当了地方或军队干部的人们，对父母的亲情至淡至薄以至归零。旧中国能送子女上学念书的，多是家里有点钱的地主富家资本家小业主。上了学的子女投奔中共，建国后当上了干部，阶级理论在上，党纪国法在下，他们只有背叛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一条路可走。常年不回家探望父母，在这一代人中是平常现象。甚至三年人祸时，明知父母挨饿，也不敢援手者，也大有人在。

这些干部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很少领受到父母之爱。一是父母忙于革命与建设，很少有时间和子女在一起，即便在一起的时间，父母也要给子女施以红色教育：亲不亲阶级分，讲亲情，叙人伦，讲爱，讲人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革一来，父母成了黑帮、走资派，他们的子女马上像他们一样，背叛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带人抄自己家者有之，写大字报揭

---

<sup>1</sup> “(李讷) 29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更多地关心如何通过李讷控制更多的权力”（杨银禄，259页）

发父母者有之，上台大煽父亲耳光者亦有之。

第二，家教差。一般来说，毛时代，职员家庭，也就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家教较好。革干军干的家族，尤其是军干家庭，普遍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统计一下55年授衔当上将军的军队干部在参军前的文化程度，就知道他们后来建立的家庭会有多少文化气息，他们的子女会受到怎样的文化熏陶。如果当父亲的家里家外，会上会下，粗话脏话都不离口，你能指望他们的子女讲文明讲礼貌吗？如果当父母的，都相信“棒棍之下出孝子”，你能指望，他们的子女远离暴力吗？“红八月”中，打人抄家最狠最没底线的就是这些军干子弟，热衷于说脏话骂街的也是这帮人。

偶读一篇文章，作者是建筑师之子，文章是纪念他的干妈的。文章说，有一次，他跟干妈上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蹦出来一句“他M的”。他的干妈马上正色制止。干妈的教诲，让他终生难忘。他的干妈是皇亲贵戚，真正的格格。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这位格格是剥削阶级，是封建遗少，是在打倒之列。文革确实把他们打倒了，有的人甚至被打死了。可是，他们的文化教养，却随着“五讲四美”兴旺起来。

“红二代”家庭教育当然也有长板，以后再谈。但仅这两块短板就足以改变中国当代文化的面貌。☞

## 【百年国史】

### 国共最后的一战

#### 一一所谓“解放大陈岛”

刘翠香

国共1949年的议和是件可笑的事情，一方根本没有议和的资本，另一方丝毫没有议和的诚意。

徐蚌会战失败后，失败主义弥漫着国民党，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再次下野，人心已去，士气全消，政府虽仍拥有百万以上大军，但无可观战绩，而叛变者屡见不鲜，国共再次无“和”可议。

是年3月，共军经冬季整编，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抽调渡江作战部队如下：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兵力60万；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兵力70万；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兵力80万；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兵力100万；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兵力20万。共5个野战军，总兵力330万。

和谈毫无悬念地破裂后，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21日晨遵照毛、朱所发“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边进攻边招降，同日开始渡江，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在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沿江强渡长江并摧毁长江防线，23日陷南京，5月3日陷杭州，22日陷南昌，27日陷上海。六月挺进福州，10月17日陷厦门。

林彪、罗荣桓的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地段上，强渡长江，16、17两日陷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8月4日投共。第四野战军在9-10月间挺进衡（阳）宝（庆），击退白崇禧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击，10月14日克广州，11月20日陷桂林，4日下南宁。

与此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4月24日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的第一野战军5月20日克西安，之后同华北两个兵团继续向西北挺进，8月26日克兰州，9月5日克西宁，23日克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达军。9月下旬，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投共。

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的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11月初开始向西南挺进，11月15日克贵阳，30日克重庆。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投共。12月下旬的成都战役击败胡宗南军，27日克成都，迄1949年12月底，除了香港、澳门已政治解决外，内陆除西藏外全部被攻克，余下的仅剩台湾、海南岛两个大岛以及福建沿海若干小岛还在国军手中。

1950年4月26日，国军自海南岛撤退，5月17日自舟山撤退，集中力量防守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台湾的幸存是个奇迹也是个偶然。

1949年10月17日，陈毅所部28军主力及29军一部在叶飞、陈庆先率领下进攻金门、马祖。官史一般说金门、马祖是台湾门户，其说实在很难自圆——金、马距离厦门大陆平均只有3.5海里，肉眼都能看个一清二楚，而直线距离台湾最近的城市台中却大于110海里，如此“门户”为何任其留存至今，实在是个

谜。当年叶飞的3个师被守岛的国军18军截击于古宁头，毙伤3千，沉海1万，俘3千，渡海部队全军覆没。时至今日，厦门导游小姐还言之凿凿告诉游客“你看见的那个地方有个万人坑”，但坑里埋的都是当年宁古头战役双方的罹难者，共军占了大半，她不知道，也从未有人告诉过她。

金门之战投入兵力数据北京、台北从未统一过。前者据粟裕称是叶飞3个团敌对方3个军，显然夸大；后者称是己方一个军敌对方3个师，比较常识。但牺牲惨烈是双方共识，粟裕等致叶飞电称“你们以3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3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就是证明。29日此电辗转到达毛泽东案头，被毛批为急躁轻敌并通报全军。（19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页100）。

对于放弃占领金、马，官史的解释——“美国企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中国承认其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明显……（收复金马）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会形成两个中国”（2011官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页638）。过于牵强，反倒另一句“不打算（再次）和美国‘迎头相撞’”同上也许比较实在。

古宁头战役（即金门战役）的深远影响至今犹在，它奠定了两岸70年军事对峙的奇特格局，却又不是毛和蒋的最后一战，6年后的1955年一江山岛战役才是国共最后面对面的交手，由此引发的“大陈岛撤退”又是一处官史无法下笔的尴尬，却是一小段民心和社会史，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本书述之于此，且为叙事连贯计而提前把它放在《内战》一章内并稍微多用一点笔墨触及细处。

大陈岛位于浙东海域，面积近12平方公里，是个优质渔港和军事要隘。大陈北就是面积仅1平方公里的小岛——一江山岛，是为大陈军事屏障。1949年国军从大陆退守岛屿，大陈又成为仅次于金门的台湾屏障，蒋介石父子及党政首要、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与美军顾问团等亲临视察和布防，胡宗南化名秦东昌驻守，蒋经国为总指挥。彼时岛上人口军、民各占一半，总数有3.4万人。台湾和金门暂时稳住后，蒋介石将军事工作交给下属，居然亲自上岛抓教育和卫生台湾（台湾国史馆典藏号028-050000-0162《改进大陈岛卫生》）。1951年大陈岛全面推行基础教育，建立若干小学并建成岛上第一所中学——中正中学。1953年大陈岛卫生所成立，大大改善了岛民医疗和居住条件，大陈文明水平迅速提高。



1955年1月，解放军在张爱萍指挥下发动海陆空协同渡海作战，以十几倍兵力的压倒优势直扑一江山岛约1千名国民党守军。这也是国共两军最后一次正式交锋。守军司令王生明激战50多个小时不支，最后一刻在电话里高呼“蒋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拉响集束手榴弹自尽（陈布雷《蒋介石先生年表》）。大陈守军多为浙东人包括大陈人，许多都是夫妻兵、父子兵、兄弟兵，直到战死无一人投降。此役双方阵亡比例接近1:1。大陈的拼死抵抗令进攻方极为震惊。

一江山岛失守后，大陈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火力面前。美国军事顾问竭力压住国民党政府和1.7万守军死守大陈的激情，力主弃岛撤向台湾，并通过苏联向北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请让守军安全撤出大陈岛，不得干扰和袭击，否则即视为中国政府向美国宣战”。毛周迅速同意了美方意见。从1月20日一江山岛战役结束到决定让国民党军队弃守大陈岛撤往台湾，美、中、苏三大国幕后运作只用了两周时间。2月2日和3月14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19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5》页23、50）并在2月6日严肃批评粟裕擅自在《人民日报》发表《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同上，页28）。本书认为在非常大的概率上，彭德怀和总参谋部粟裕都不清楚美国曾发出过如此极端、不顾一切的威胁。

毛绝对不是不想打大陈而是打不起，从1954年6月2日、7月24日和8月21日他三通在军方高层来电上的批语可明确得知：

1. 在粟裕6月1日“于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敌舰的处理报告”上他批示“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19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4》，页495）

2. 在军委防空司令部8月20日“关于大陈岛地区美国空军活动情况及我机起飞情况给总参谋部的报告”上他批示“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机美舰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同上，页533）。

3. 在华东海军司令部8月21日“关于攻击大陈港敌舰的方案给海军司令部的电报”上他批示“请考虑是否调华东军区福建、浙江、上海三军区的负责人各一人来京讨论此问题。此电所提卅天准备时间是必要的，必要时还可以延长至四

十天”。(同上, 页 520)。

谁敢说毛的“打”心不大? 是美国的威胁喝止了他, 而他的退缩却正是福建、浙江、台湾中国人以致全中国的中国之大幸。

1955年2月5日, “大陈撤退”开始。按照最初计划, “撤退”仅仅是1.7万守军的撤退, 因为光是运兵, 台湾海军已捉襟见肘, 必须美军帮助才行, 可蒋介石偏偏执意要把1.7万百姓也带走。一句“大陈百姓中有愿意随国军一起去台湾者不能拒绝”。大臣行政专员沈之岳1月26日贴出布告“凡志愿疏散后方之民众, 不分男女老幼, 自即日起至2月2日止, 至各该县政府登记, 以便准备交通工具”, 表达了老蒋要带走他们的意思。但时间上极为苛刻: 想去台湾者马上报名登记, 过时不候刘毅夫《大陈列岛军民完整撤退来台补记》。不料告示一出全岛沸腾, 大陈人通宵未眠。令两蒋万想不到的是, 天还未亮, 1.7万大陈老百姓就一致决定全体去台湾, 来不及也用不着登记, 统统走, 一个不留!

但是除非美军相助, 台湾完全没有能力将岛上3.4万人紧急撤往台湾。此刻美军毫不迟疑伸出援手, 同意将所有大陈人撤往台湾的计划, 两蒋欣喜万分, 一个名为“金刚”的“撤民计划”迅即被制定和执行。2月7日撤退开始, 美国调来6艘航母, 比5年前朝鲜半岛危机时多了一倍, 其中包括1942年日美海空大战中震慑过东京的“大黄蜂号”和保卫过夏威夷本土的“约克城号”。浙东海面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庞然大物, 吓坏了负责监视大陈撤退的军官(据说当时真的吓瘫了)——除了航母, 美军第七舰队加上台湾海军共约150艘军舰全部出动, 浩浩荡荡把浙东海域挤得满满当当。

到2月9日, 大陈平民全部撤走, 10日守军才开始撤退(1955.2.22日本《读卖新闻》)。同时运走的还有4万吨军用物资。撤退军人和百姓精确到个位数(16,353: 17,132)的数据居然是史官提供的(陈忠杰《海天雄师 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页117)。大陈百姓锅碗瓢盆、粮食牲畜、祖坟家庙啥都不要了(也没有条件带走), 码头、渔船、房屋、学校、卫生所悉数毁坏烧光, 只带走了各村10余座菩萨(杨贵华《纪念人民解放军一江山岛登陆作战胜利50周年》), 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上了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战争撤离菲律宾时的名言“我将回来”(We shall return)刘毅夫《大陈列岛军民完整撤退来台补记》。整个大陈岛瞬间变成死岛。只有一个卧病不起的垂死老汉实在走不了, 家人一开始想留下来陪

伴他，老汉以死相逼——家人留下一个就即刻寻死。他就是“大陈撤退”之后解放军在岛上唯一找到的一个“半活人”。史官曾口风不慎露出一句“（此人是）蒋匪帮唯一没有劫持走的老百姓”，却又说“居民不愿走的便惨遭枪杀”（陈忠杰《海天雄师 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页118）。此话怎讲？只能问史官自己，顺便也请他说说各种官史中找不到“大陈岛”三字而“一江山岛”四字俯首皆是之难言之隐。当年出版的《蒋军在大陈岛的滔天罪行》小册子如今成了最好的反证——假如不是大陈百姓拼死相随，哪一支军队会在溃退时出动航母“挟持”毫无战斗力且毫无财产的平民？

60多年前大陈人的这次破釜沉舟拔根式迁徙，也只有700年前南宋10万军民崖山蹈海堪比。如果说1949年大陆一众大小知识分子还沉浸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蜜液中，6年后的大陈，所有的渔夫村妇、贩夫走卒都看透了应该何去何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毫不迟疑用脚投了票。可惜偌大一个中国也只有大陈有这样一次选择的机会与权力。摘1955年2月22日日本《读卖新闻》对大陈岛撤退的报道以证：

从1955年2月1日开始。国际社会就被卷入台海紧张局势步步升级的态势之中！2月1日，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邀请北京政府派员参加安理会紧急会议的提案（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该提案当场以10对1票被否决。同日，美上院讨论通过了台湾停战议题。美议会审议中弥漫着‘不会因台湾问题与中共开战’之声音；亦有要求台府放弃金门，马祖，退守台湾本岛之声音；中方（台湾政府）回应：让步的限度是全民公投，“撤退同时美军第七舰队发声表态，不排除在大陈岛撤退时在台海领域对中共军力使用原子弹。（1955.2.22日本《读卖新闻》，台湾国史馆 典藏号005-010205-00035-012。）

在大概率上，这才是大陈全员撤退成功最关键处。向来声称“不惧核威慑”的毛泽东不过如此，却是国人大幸。关于大陈遗民在台湾的境遇，他们的后代多有著述，此不赘。

至于1958年8月23日开打的金门炮战如何从开始的壮志凌云变为后来的成人儿戏——周中开炮、周末休息，平日开炮、节假日休息，逢单开炮、逢双休息……

沈卫平《金门大战》，只能放在“中苏分裂与庐山突变”一段小历史中才讲得清楚。官史对8.23炮战一般用“统战”“维持联系渠道”“政治外交”甚至暗示彼时领袖就有“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等等试图解释，毛泽东则自造出一个“冷战共处”的新名词解嘲，却都对9年前那一万多名或战死金门滩头、或被俘坚不回大陆、或被遣俘后屈辱终身的士兵无法交代，对彼时炮口只对中国人不对美国人无法交代，对瞒着苏联人开打，又把美国的疑心引向苏联无法交代。

从1958年8月23日一直打到1979年中美建交的那个元旦，共计20年4个月零7天的“金门炮‘战’”，至今在军事、政治、外交三个方面都还没有脉络清晰、逻辑缜密、能够服众的解释。出于各种国际与国内的政治考量，“武装统一台湾”终未实施，形成70年海峡两岸骂而不打、器而不战的诡异而怪诞的局面。❶

### 【文革轶事】

## “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朱成昭如是说

1967年2月，朱成昭在一次全院大会上，借检讨为名，宣传他的“四大观点”。戚本禹与他谈了三四个小时，辩不过他。只好让他在地质学院“闭门思过”。期间，跟朱一起造反的同学伏庆是去看朱成昭。朱对伏说，“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还对伏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伏庆是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朱成昭回答：“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❷

——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载《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上），第107页。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年

【百年中国】

## 画说我的一生 (21)

——向阳湖上五七宝 (1969-1974)

刘海鸥



1968年9月30日毛泽东对东北柳河五七干部学校的经验做了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像中国所有的事情一样，上面一句话，下面一阵风，全国各大小机关马上办起了“五七干校”，几乎所有的城市知识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最新最高指示”永远是在晚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时间发表。单位领导已经得到“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的通知，让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收音机旁等待，并准备好旗子标语锣鼓等东西。发表之后，群情激昂地喊一阵口号，就敲锣打鼓地去游行了。

1968年9月份的那天夜晚，五七干校的指示发表。永丰中学二三十个老师像每次一样，孤魂野鬼般摸黑在几个村转几圈，闹到深更半夜。我没想到那天我挥动语录欢呼庆祝的五七指示，将开启爸爸妈妈几年的苦厄。



被毛主席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干脆撤销，爸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单位一起连锅端到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动员大会上，军代表告诉知识分子，你们就在那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1969年9月底爸爸们突然接到指示立刻离京。具体时间是9月26日，中秋节的前一天。这是军宣队特意挑选的日子，带有惩戒性——就是不让你们在家里过中秋团圆节。这种节日是不利于贯彻五七指示，不利于干部的思想革命化的。

我那阵刚刚调到东玉河小学的初中“戴帽班”教书。一天收到了爸爸寄来的一个明信片，说某天要坐火车离京赴干校。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里，过几天又来了一封明信片，说时间又改在某天，我还是没在意。我觉得不应该为私事请假，也没有时间请假，而且这个小学校长痛恨老师请假。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个明信片，上书：“海鸥：接最后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门车站上车。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队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宣誓，12时进站。你就不必回来送我了。你姨夫送来一哈密瓜，极好。元元有信来，你母亲一切如常。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时半。”

此时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经走了。我突然意识到，爸爸连发三封信给我，封封说不必送，实际上就是想让我送他。爸爸走时没有人送（两个妹妹都已经去插队，妈妈正被整蛊，不能请假）。我想象着爸爸在火车站东张

西望，在最后一刻仍然希望亲人的身影出现，不禁痛哭起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应该回家帮爸爸整理行装，与爸爸话别。

我不管校长会说我什么，马上请假回家，我的心里充满对家的眷恋。回到家里，爸爸再也看不见了，桌上只有他给我留的一块哈密瓜。

几十年来，对这件事的追悔如毒蛇一样地咬着我的心，一想起来心就疼，就要流泪。爸爸的这张明信片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日记本里。如果问，这一辈子你最后悔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我没能送爸爸去干校。



与此同时，全国妇联正在加紧把妈妈打成阶级敌人。妈妈的历史情况早在1955年审干时做了定论——历史清楚，没有问题。可这会儿不弄出几个坏蛋来就不足以显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材料不足就捏造，妇联的专案组全国走了一圈，回来对妈妈宣布，所有人的证词都证明她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变节分子。妈妈瞠目莫名，被迫在党组织的结论上签字。

后来姨父所讲的事情让我知道那些人的卑劣。妈妈曾在姨父领导的广东东江纵队工作过。两个妇联女外调人员找姨父调查妈妈的党组织关系问题，意在把妈妈打成“假党员”。当时军内在文革的震荡下也分化得十分厉害，海军少将姨父也受到了冲击。姨父原原本本地提供了妈妈的组织关系运转的情况。姨父的证明当然不合她们的要求，两个女人立时面目狰狞起来，其中一人对姨父咆哮道：“你

自己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还胆敢保一个叛徒过关，罪上加罪！”这哪能威胁得了十二岁手刃地主参加革命的姨父？他眼睛一瞪，“啪”地一拍桌子，怒斥道：“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还要不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滚出去！等你们想好我的问题，再来找我。”姨父的眼睛大而圆，稍外突，瞪起来就是传说中猛张飞的铜铃眼，虎虎逼人。两个外调人员没想到竟有人如此凛然，害怕姨父那气势，灰溜溜地撤走了。第二天两个人想好了，回来了，态度特别和蔼，特别配合，乖乖地接受了姨父的证词。

可以想见，妇联外调人员是怎么对待其他证人的。像姨父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是以保住自己为要。可惜姨父的正义对妈妈并没有什么帮助，专案组在大会上出示那些不利于妈妈的证明时，唯独隐瞒了姨父的证词。

随后他们逼迫妈妈立刻下放干校。妈妈选择了去爸爸的干校。她不愿意去妇联干校，家里六口人已经分散在天南地北五个地方，再增加一个地方，互相的联络就再增加一些困难。还有，那个妈妈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已经伤透了她的心，昔日的同事朋友都已经成了乌眼鸡，何况她现在是什么身份。



1970年初我突然意识到，我有了享受单身国家职工每年12天探亲假的权利，我独身一人，可以去探望父母了！寒假一到，我就收拾行装，买了一些爸爸妈妈爱吃的点心，坐火车南下。到了咸宁，离干校还有二十多里路。我找到文化部中转站，帮他们装货车，然后搭车奔向干校。山回路转，周围是绿树掩映的红土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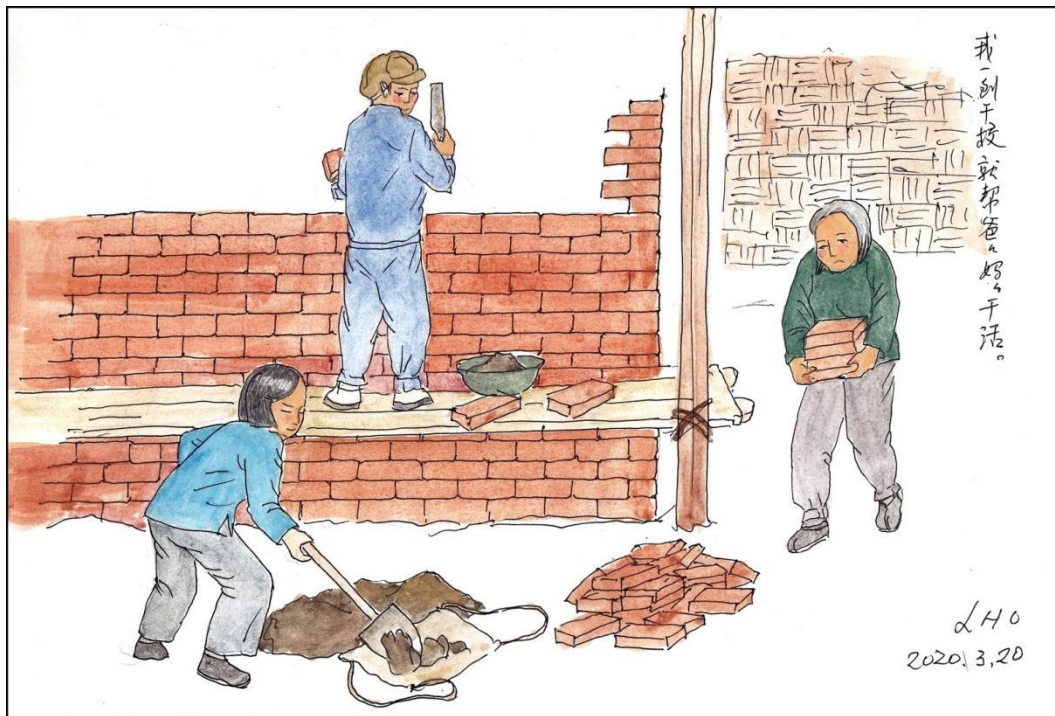


陵，虽是冬天仍是杂草野花一片绿意。想到即将见到爸妈，心情非常好。

文化部的干校在湖北咸宁县一个冬天干涸夏天积水的湖边，这个湖在古代有一个优雅的名字“云梦泽”，斗转星移，日月沧桑，湖水早已干涸，只是在大涝之年才是一片汪洋。当地老百姓没有幽思怀古之情，管这湖叫“斧头湖”。文化部干校在此安营扎寨后取了一个应时逸上的名字“向阳湖”。文化部所属各个文化单位除了几个留守人员，几乎全数人马聚集到这个荒蛮之地。

“五七干部”们初到“向阳湖”，什么都没有，暂住老乡家，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围湖造田——在湖底开荒种地。首先沿湖筑起了一条十余里的围湖大堤。本来“向阳湖”是长江的分洪区，大水一涨，可以泄洪，缓解涝情。大堤一建，老百姓就遭了殃，涝季雨水不能再排入湖里，淹了庄稼地。大堤外围还挖了宽约二丈的壕沟，雨季沟里注满水，曾经淹死过一个老乡的孩子。

干校几年在湖底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即使有一点粮食还没等到成熟就叫老乡偷光了。不过国家本来也没指望五七干部们打粮食，“改造”才是正题。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



干校是军队连排班的编制，爸妈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十四连。

我到干校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正在搬砖盖宿舍，这时要盖的房子，好歹是个砖房了。爸爸妈妈没有预料我会跑到干校来，非常惊喜。妈妈是“小工”，为砌砖瓦的“大工”和泥递砖打下手，小工我在农村干过，活路比大工还要累。妈妈

正在搬砖，穿着一件大襟褂棉袄，裤脚绑着绳子。爸爸是“大工”，正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他穿着一身“再生劳动布”衣裤，（是那种又厚又硬，放在水里如铁板一般坚硬的布料），戴着棉帽，脖子上围个手巾，既不像工人又不像农民。

一放下行李我就跟妈妈一起搬运砖头。妈妈一次搬四块，她的一只胳膊早年摔断，用两根钉子连接着。真担心她的胳膊经受不住再次断裂。在干校里是没什么条件可讲的，在这里不管什么人，岁数多大，身体如何，都在干着同样的活。

我一下子搬十一二块，干得特别卖力。我努力干是为了她，为了让她在连队里有个好点的名声和待遇。



让我十分震惊的是亲眼看到了孟超老头的遭际。孟超才华横溢，他的剧本《李慧娘》曾风靡大江南北，文革前突然被批为“鬼戏”，说是目的在于反党。孟超从此遭罪。我在干校的工地上看见他时，觉得他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骨瘦如柴，驼背，头发髭着，脸瘦成一小窄条，嘴部凸出，露出两颗大龅牙，样子与鬼真是所差无几。他抱着两块砖，对，是抱着，他的臂力不够，还要靠胸来帮助。他抱着两块砖跌跌撞撞地走着，周围一群“共产主义学校”放寒假的孩子追着他叫骂：“老魔鬼！装孙子！偷懒！”

所谓“共产主义学校”是为下放干部的孩子开办的。我不解的是，1970年在城市里中学基本上恢复了教学秩序，红卫兵已经偃旗息鼓，打人骂人的事情也已经鲜见，为什么在干校倒死灰复燃了。那些孩子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又不是什

么红卫兵。带头闹得最凶的是大翻译家萧某的女儿，她自己的爸爸的处境比孟超也强不了多少。这女孩据说在干校里极为革命，左数第一名，很惹人反感。

突然，孟超绊倒了，抱的两块砖摔在地上，脸正好磕在砖头上。嘴里流出的血和鼻子里流出的清汤或者是鼻子里流出的血和嘴里流出的清汤混在一起，蹭得满脸和砖头上都是，又把砖灰粘在脸上，真正是一个厉鬼的样子了。他趴在地上，两脚翘起，半天不能动弹。孩子们围着他转着跳着喊着：“老魔鬼，装洋蒜，快起来！”他一直也没能站起来，我实在不忍再看，走开了。

爸爸和孟超是朋友，他们在桂林时就相识，常有来往。1949年爸爸刚到北京，就去找孟超。那天的日记写道：“昨天到东四二条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找孟超。孟超比在桂林还显得健旺，虽然头发多半都白了。他太太还留在重庆。”后来两个人又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供职。爸爸说孟超是奇才怪才。晚上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摇头慨叹：“唉，这些孩子知道什么，他们了解孟超吗？他们看过《李慧娘》吗？简直是无端的仇恨。”爸爸说得对，文革制造了仇恨，是无端的仇恨，其种子深深地种植在孩子们的心灵。以至几十年以后这种仇恨还在中国人的头顶开花结果。



其他干部的待遇不比孟超强多少，穿得破破烂烂，不伦不类。当地老乡称五七干部为“五七宝”，还编了一个顺口溜：“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着大手表。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基本概括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所谓“吃得好”是相对贫穷的老乡而言，至少干部每天

能吃到坚硬的红米饭和南瓜汤。

我觉得“五七宝”这个称呼很可爱。问妈妈为什么叫五七宝。原来“宝”是此地人对孩子的昵称。老乡对五七干部的这个称呼极具幽默感，又似讽刺又似同情，却一语道破真谛。

老百姓说的没错，但他们并不知道五七干校里全是宝，都是国宝。中国当代的文学历史美术文化各方面的精英耆宿都集中在这里：张天翼、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张光年、孟超、陈白尘、侯金镜、臧克家、李季、郭小川、严文井、楼适夷、韦君宜、冯牧、周绍良、徐邦达、刘九庵、耿宝昌、卢光照、许麟庐。金人、孙用、萧乾、纳训、刘继卣、邵宇……不可胜数。我爸爸也算一个——著名俄国文学翻译家刘辽逸。



妈妈带我到她的宿舍，把我安置在一个回京探亲的人的空床上。在干校的头一两年，所有的干部和他们的配偶都是各住男女宿舍，孩子则在县城的“共产主义学校”住宿。

简陋的小土屋里住了五六个人，床横七竖八地摆着，每人床头用箱子做床头柜，上面摆一些水杯之类的日常用品。

同住的人对妈妈都十分友好，只有一个年轻的法文翻译徐某某，是个班长之类小头目，把妈妈当做牛鬼蛇神看待，颐指气使。这是一种因为自己家庭出身很差所以非常“革命”的人，对上和对下的嘴脸不必多说也可以想象得出来。我非

常为妈妈不平，跟爸妈抱怨过她几回。爸爸笑笑：“这种人多得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妈妈反倒看不起我，说：“不要把自己的身份降得那么低吧，值得吗。”

其实妈妈到文化部五七干校真是因祸得福。妇联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像她这样没有权势没有背景的人正是人家手中拿捏的对象。那些不幸发配到妇联衡水干校的“敌我矛盾”们被三天一小批，五天一大斗地捱生活，而妈妈在爸爸的干校却如鱼得水。尽管干校里也开批斗会，但是与她无关。妈妈和知识分子们处得都很好，她的历史知识和古文知识极为丰富，和那些人谈古论今，有很多共同语言，心情舒畅之至。

晚上是开批斗会的时间，那阵正挖“五一六”分子，每天晚上让“五一六”分子交代同伙。采取的是疲劳轰炸政策，或叫“熬鹰”，熬得人受不了了就开始胡乱指证，就像过去挖“AB团”“改组派”一样。于是每天晚上都是“战果累累”，挖出一大串人。究竟什么是“五一六”分子，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爸爸妈妈们的“任务”就是写大字报，根据揭发的材料进行批判。我到的第一天晚上，就帮他们抄写一份声讨的大字报。在干校那些天，我几乎天天都要抄写大字报，甚至帮他们起草批判稿。骂的是谁，我根本不认识，那时的大字报不过是为了制造气氛，内容就是些套话，以不变应万变。



干部是不允许吃“偏食”的。妈妈一生就爱吃好东西，嘴馋得不行。我带去的奶油小饼干不敢公开地吃，我和妈妈只能远远地走到大堤口，坐在树下，偷偷

地吃。饼干很快就吃完，也解不了多少馋。我真后悔没有多带些好吃的东西。

妈妈带我去“参观”王六嘴村的“百货大楼”饱饱眼福。所谓“百货大楼”是干部们给王六嘴的小供销社起的名字。王六嘴只有几十户人家，供销社也就十几平方米大小，黑洞洞的小土房。只有一些农具化肥蜡烛火柴煤油电池手纸之类的东西出售，可能还有一些块糖，饼干，一览无余。加起来可能还不够百十来样商品。五七干校来了以后，供销社也进了一些罐头，但军代表有令，不可在供销社买吃的，破坏五七战士的形象。还是有人偷偷地买，我和妈妈去时，正碰见郑振铎（作家文学史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因飞机失事殉难）的大公子及其夫人在那里买肉罐头，见到我们有些尴尬，搭讪着就走了。



军代表是干校的最高领导，本来不过是县人武部的小头目，一下子管了中央级干部，便有了洪秀全当上皇帝的感觉，动辄威胁不好好改造“就把你们‘突突’了（“突突”是用机关枪扫射的意思）。”只冲这句话就知道五七干部们的地位有多卑微。农民真是不能当皇帝，刚当上这么一个小官，食色本性全都暴露无遗。

有一些人家里从北京寄来了罐头，饼干奶粉一类的东西，一到就被军代表截获据为己有（我寄的包裹也被没收过，从此爸妈不让我再寄东西）。干部们也不许去村供销社买吃的，只能周末走二十多里地到咸宁县城买点东西解馋。一个军代表站在路口，对回来的人一个个检查购买的东西，且不问自取。干部们不敢得罪丘八爷，您随意拿。军代表每次都大有斩获，装满一书包，够一个礼拜的口福。

军代表还闹出了些风流逸事，十四连（爸妈所在“连队”）有两个“要求进步”的年轻女干部，当了军代表的秘书，都在积极争取入党。常常和军代表“谈心”至深夜不归。其他群众知道是怎么回事，恨得不行，便设了捉奸计。一夜，一个女进步分子没有回来，于是同屋人以关心她的安全为名，大张旗鼓地唤起全连队所有的人去寻找，打着火把晃着手电喊着名字。直奔军代表的住处，军代表没在，最后大家在黑灯瞎火的档案室里找到这一对男女。据称是在黑屋子里“看”档案研究问题。这一类的事立即传遍干校。此事发生后那个军代表被调走了。



春节到了，连队开恩，允许夫妻团聚，所谓“团聚”就是夫妻可以在一起睡三四天，而且只限于年纪轻一些的夫妻。这些人一年到头在一起劳动，吃饭时两口子也坐在一起吃，就是得各睡男女宿舍。像爸爸妈妈这样的老夫老妻，“团聚”就免了，继续各在各宿舍待着。大年三十这一天，夫妻都在干校的年轻人喜气洋洋地搬家，连队专为他们腾出来了几间房子。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古文部的编辑，稳坐钓鱼台，依然埋头他最喜欢的修理钟表的小手艺活。他的太太是歌剧院的女高音，看见其他人都在欢天喜地地搬家，她急不可待地和丈夫吵闹，可男的不动声色地继续搞他的小修理，把太太气得当众大哭，最后赌气不搬了。我虽不懂“搬家”的紧迫性，也会心想，这一赌气，又得等一年了。几十年后，我看过一篇“向阳战士”写这次团聚的文章：空房不够，两对夫妇睡一个屋子，床隔几尺远，挂起一张床单，夜间鸡犬之声相闻，无奈人有三急，只好厚起脸皮。

干校的饭非常寡淡，南方的粗糙两季稻米还算是好的，多数情况下是吃窝头，



菜也是清汤寡水，老倭瓜洋白菜。春节伙食稍微改善了一下，各班排从食堂领面粉和拌好的饺子馅，自己包饺子。饺子馅以白菜为主，里面可闻一点肉腥。知识分子们包的饺子真不怎样，软塌塌地躺平，包好后大锅一煮，大半都开了花。



趁着春节的几天假期，干部们三五成群到附近的县镇打牙祭。咸宁县城离干



校二十多里地，汀泗相对近一些，那天爸爸和蒋路叔叔带着我到汀泗去吃馆子，说那里的红烧鱼量足味美，一定要吃。妈妈没去，她想趁这难得的假期在家好好歇歇。我们沿着高高低低的丘陵地走着聊着。蒋路叔叔也是俄文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译者），和爸爸是最好的朋友，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快到汀泗了，在京广铁路线的一侧，有一座北伐军烈士纪念碑。那塔立在一个农家院的后面，周围被荆棘乱草窠子包围着。塔已经变成黑黑的颜色，上面的国民党徽被涂了一个瞎疙瘩，只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字样还隐约可辨。早在小学历史课上就知道北伐军第一次大胜仗就是在汀泗桥与贺胜桥之间打的。今天亲眼看见这四十多年前的革命遗迹，我非常兴奋，拿出照相机站在塔下（需要钻过荆棘）照了好几张相。



汀泗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很失望，绝大多数饭馆（其实本来也没有几家）关门，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一家开门，爸爸他们盼望的红烧鱼根本没有，只有炒麋子肉。只好勉强吃了一顿，麋子肉不好吃，硬，不香。爸爸说实际上是老水牛肉。妈妈连吃老水牛肉的口福都没有，一年下来也就是这几天可以放松一下筋骨，她宁可在宿舍待着，吃窝窝头，也不想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去走几十里地。本来说好要给她带回一个红烧鱼的，没能实现。想到妈妈在“家”里等待，我真是心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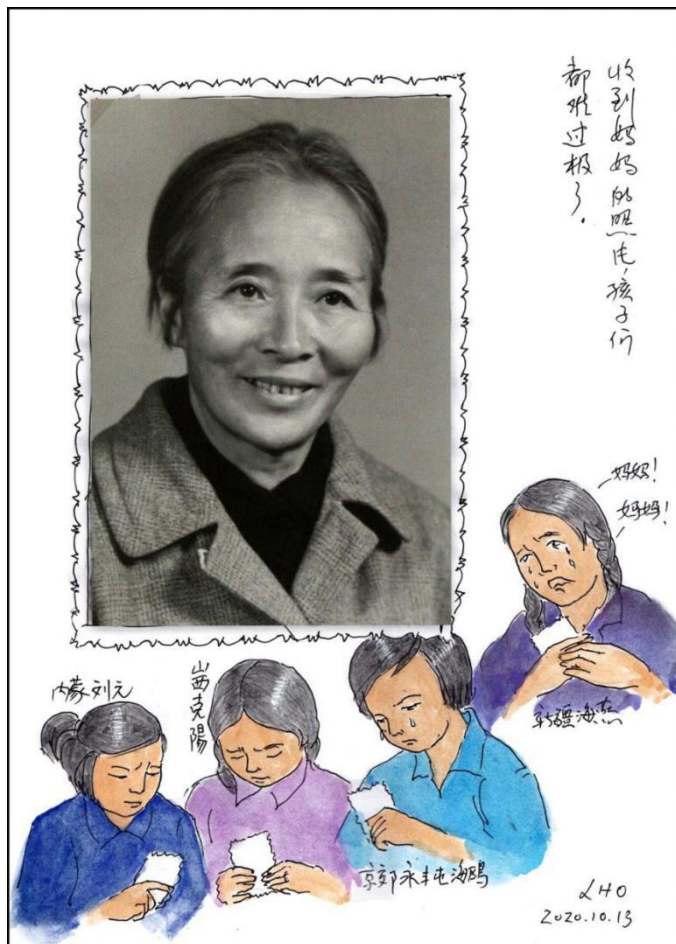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我自告奋勇要去咸宁县城买些熟菜回来，县城的饭馆总不会关门吧。

妈妈不同意，这样对她太奢侈了，她不忍心劳累我。我坚持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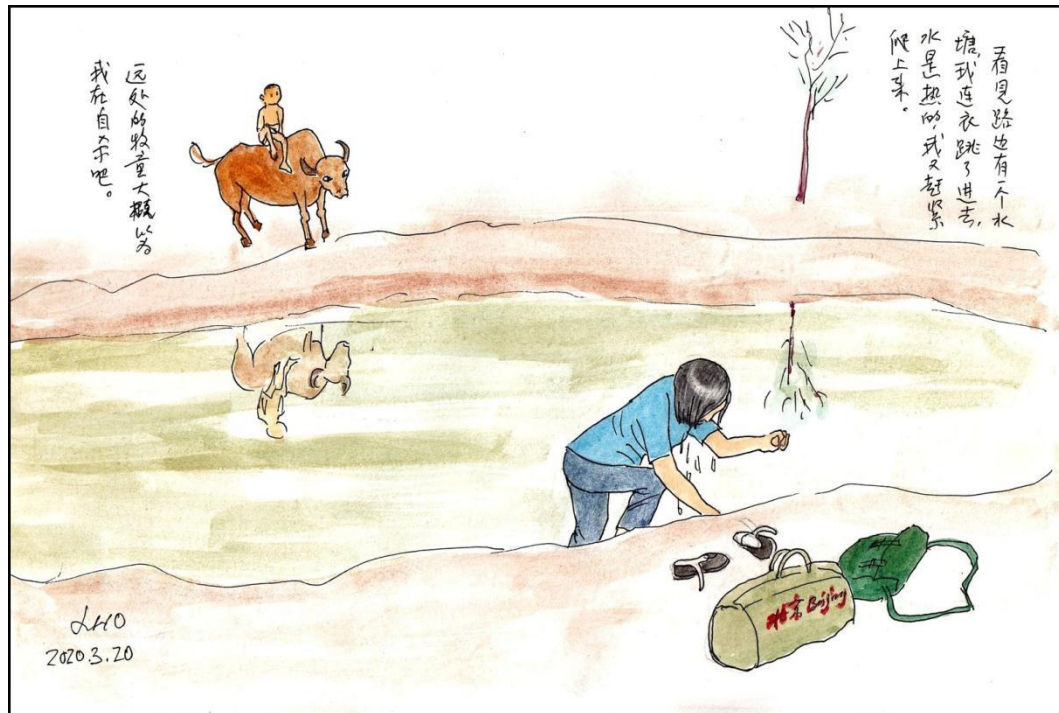
那天早上，我提了三个饭盒，妈妈送我到通往县城的大堤上，坐在上堤前最后一棵树下，拿出我从北京带去的最后一点奶油小饼干当早餐，然后，她用包装纸仔细撕了一条鱼，放在一个饭盒里：“买一条干烧鱼，他们的鱼很新鲜。”撕了一只鸡，放在另一个饭盒里，“买一个炖鸡块。”又撕了一头猪，“买红烧肉。”她最喜欢吃油香盐咸的大肥肉。

但是又让妈妈失望了，好不容易走到县城已经过了中午饭点，所有的饭铺都已休息，当然不能再等晚上饭铺开门，紧赶慢赶往回走。拎着三个空饭盒天擦黑才到干校，远远看见妈妈正站在大堤那头翘首盼望。她不放心的一个人跑那么远路，当然心下也希望我能带回点好吃的。这一趟跑得我心里更难受。

假期很快满了，我不得不告别父母，回到北京空无一人的家。



夏天到了，妈妈寄给我一张照片，是她去武汉看牙时照的。照片上妈妈头发花白，颧骨突出，两颊凹进，牙齿也少了几个，像一个晒干的葫芦瓢，却神采奕奕地咧嘴笑着。看了让人伤心，我的眼泪立刻流出来了。我想立刻奔到他们身边。



暑假一到，我立刻收拾行装奔赴干校。我真没有料到咸宁的天气那么热，下了火车沿着大堤去干校，路被晒得干裂，一棵树都没有，正是中午时分，室外的气温肯定有五六十度，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了，见路边有一个水塘，不太深，是给牛洗澡和饮水用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穿着衣服就跳了进去。没想到浅浅的塘水被太阳晒得滚热，比人的体温还高，我一下水更觉得没法喘气，扒着泥塘便赶紧爬上岸。塘对面一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不知我是否自杀。浑身湿淋淋地走路，觉得稍好了一点。到了干校，衣服已经全干了。



屋子里的温度也有 42 度之高。当地的老乡都是早出午归，中午下午最热的

时候就在家栖息，但是“五七战士”们得不到一点喘息的机会，整天全都在大田里干活。在灼热的天气下，知识分子们都已斯文扫地，女的上穿一件薄薄的马甲线衫，有的甚至连乳罩也免了，下穿一条短裤，男的只穿短裤衩，打赤膊。

人们的情绪都有点惶惶然。妈妈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刘敏如今天死了。妈妈说刘是一个大胖子，有高血压之类的毛病。他还有些“历史问题”，解放前他的家乡是日本鬼子和八路军的拉锯地区，是两面政权。他当时既是八路军委派的村长，又是日伪军委任村长，结果“就高不就低”，被定性为汉奸，历史反革命。军代表革命派对这些反革命毫不同情，巨热暑天照样干活，就在我到的那天，刘敏如正在抬水，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再也没醒来。究竟死于什么，是中暑还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没人追究。大热天气下，尸体就摆在地边，不久就爬满苍蝇，于是就地埋葬。没有立坟头，埋在哪里，已不可考。到那时为止，爸爸妈妈所在的十四连已经死了四个人了。后来统计，干校几年十四连一共死了八个人，整个干校有四十多人死于非命。



咸宁地区的天气恶劣，热的时候真热，下起雨来则连绵不断，下得人都长毛，但是决不要期望下雨收工。老乡们对干校的古怪做法也编了一个顺口溜：“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晴天不干，大批判。”下雨干活虽然是无效劳动，但是目的在于锻炼知识分子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晴天不干”是要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更多数时候是“无雨拼命干”。

每天早上男女老少，排着队，唱着歌，走四五里路到湖底干活。雨中和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比泼了油还滑，不断有人摔倒。爸爸说：“你妈妈是一个摔跤冠军，几乎天天都要摔跤，走在路上，要是听到后面‘扑通’一声有人摔到田里，不用回头，准是你妈妈。”我听着咯咯笑起来，没留神眼泪已经淌下来。

万幸的是，这么摔打，竟没有伤了妈妈的筋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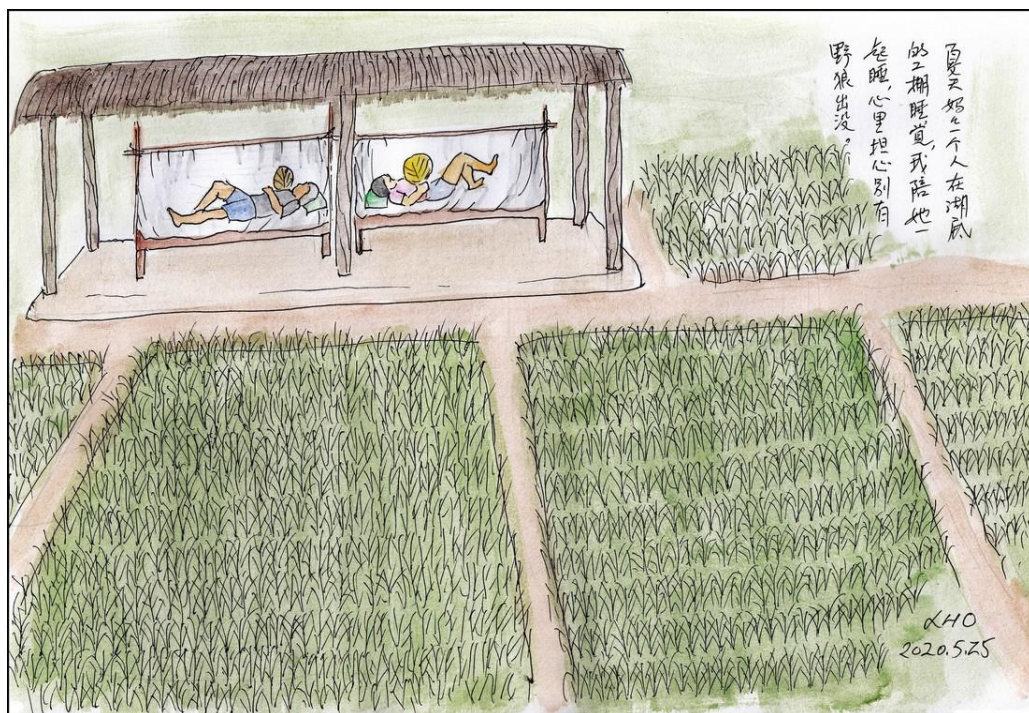
妈妈正在闹肾炎，连队照顾她，让她烧水。这个活也不轻省，尤其是在室外气温四五十度的夏天，在田头简陋搭建的工棚里，整天守在炽热的大灶前添柴加火。妈妈穿着一条爸爸的大裤衩，一件香云纱的无袖短衫，那是她五十年代的一件旗袍剪短的。香云纱已经变成黄色，汗水湿了干，干了湿，上面洇着一圈圈白色汗渍。妈妈让大家上工前把暖水瓶水杯放在灶棚，烧好水，一瓶瓶替大家灌满，再把一碗碗一杯杯水晾起来，工间休息的人端起来就能喝。妈妈的肾病不轻，人又黑又瘦，脸整个瘪了进去，还浮肿，但是做起事来仍是一丝不苟，赢得了十四连干部们的敬重，在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报中，竟然有一张是表扬妈妈工作的，题目叫“有口皆碑汪老太”。一个“有口皆碑”足以报答了妈妈的全部努力。



爸爸是一个放牛倌，正合了他喜好大自然间一切生命的本性，又合了他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性格。他看管的三头牛各取名为“花和尚”“大老黑”“机灵鬼”。爸爸只管放牛，犁地时蒋路这些“年轻”一些的跟在牛后面扶犁，有时还要和牛在前面一起拉犁，十分原始。不过放牛也不容易，爸爸同事卢永福叔叔说：“牛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有一次，老黄牛一时性起，发了疯似的从大田向山上狂奔，五十七岁的‘放牛娃’刘辽逸，呼哧呼哧地跟在后面紧追。那情景真值得电影镜头去捕捉啊！”这是公牛发情逃跑，遇到这时候，爸爸追也追不上，急得团团转，只好自掏腰包请周围的老乡帮忙抓回来。



下工后，“战士”们都在湖边的一个沟渠里洗澡，这沟渠宽丈许，边上长满了杂草。男人先洗，女的等男人走光了，放心大胆地脱衣洗身。已经是傍晚，刚到水边，无数只蚊子扑了上来，叮得我浑身刺痒，忍不住跳脚骂粗话。



夜间屋里的温度仍然居高不下，妈妈嫌屋里太热，独自跑到湖底睡觉。在湖底的稻地边上，干部们搭了一个凉棚，且很有诗意地称之为“凉亭”。其实就是几根木柱支起一个顶棚，为的是在工间休息时能有一个遮阳的场所暂时避一下。

妈妈把自己的床搬到凉棚里，夜间就一个人睡在湖底。我去了以后，也陪她在凉棚里睡觉。夜晚，天色漆黑，我们早早就钻进了蚊帐，白天大地吸进的热气这时释放出来包围着我们。没有风，一点凉爽都感觉不到。远处是虫鸣蛙叫，近处蚊子把我们的蚊帐都包围严实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担心着有野狼出没，又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心中觉得无比凄凉。

第二天很早醒来，太阳就已经老高了，我也已经是大汗淋漓。身上被蚊子咬了好几个疙瘩，蚊帐里趴着六七个吸足了血飞不动的母蚊子。

因为天热，妈妈根本就不“上山”（住地）。需要什么东西，就让我回家去取，妈妈总是有很多闲情逸致，要取的东西很多，她不是写在一张纸上备忘，而是用小剪刀，在纸上剪出需要的东西，比如剪出指甲盖大小的水碗牙刷避蚊油。说是

闲情逸致，实际应该说是妈妈一贯的对生活的乐观和热爱。她在干活时，发现地里刚出生的小竹笋，便收集起来，晾干，夹在信里寄给我。竹笋有半寸大小，有模有样，可爱得不得了。妈妈最喜欢这些小玩意，也知道我喜欢。见到这些小东西，便知道了妈妈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生活的情趣不变，使我安心了许多。

我们在湖底住了几晚，因为下雨天气凉快一些，我们又回到了“山上”。在宿舍我有空就给爸爸赶制两件衣服。天气不是炎热就是潮湿，爸爸经常闹皮炎，他让我给他买了一丈白粗布，缝两件中式褂子，穿在身上可解痒。我买的布极粗糙，上面疙里疙瘩，爸爸直说好。我便动手剪裁，一针一线地缝制，我很会做中式衣服，那阵我冬天穿的中式罩衣都是自己手工缝的。



离开干校的时候，爸爸送我，早上三点钟我们就出发了。火车是六点的，在咸宁这个小站只停一两分钟。我们必须早作准备。要抄近路，需要划船在河汉里走一段，然后上大堤。爸爸撑着小船，在芦苇荡中滑行。整个干校还在睡觉，只有连队的宠狗小花早早起来沿着河岸跟着我们，低声地呜呜着。走到一个分叉处，小船离开了小花所在的岸边进入另一条支流。爸爸喊道：“小花，回去。小花，回去！”小花只好站住，目送我们远去。





在夜幕中上了大堤，急急匆匆走到咸宁县。到了火车站时快六点了，火车预计六点五分到达。爸爸特别想在咸宁吃一顿北方式的早点：油条豆浆。车站边上的早点铺还没开门，我跟爸爸说：“你等吧，我先进站了。”爸爸说：“来得及，来得及。”好不容易早点铺开门，吃的还没准备好，要现做。我勉强吃了几口油条，跟还在等豆浆的爸爸说：“我先走了，你吃完就回去吧。”就离开了。



我串连已经成精，从来不到候车室跟那些背着筐，挑着担的慌慌张张的老乡一起排队。我不慌不忙地绕过车站，顺车站旁的铁路走进尚无乘客的站台。车一进站，我就轻轻松松地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车快开了，突然我想起了爸爸，并神差鬼使地站起来，到车门口张望。果然在济济人头中看到了爸爸的花白头发，可怜的爸爸夹在拥挤的老乡中间，东张西望，目光急切地寻找我的踪影。我逆着上车的人流，对下面大喊：“爸爸，我在这哪！”可是他根本听不见。就在同时，车门关了，火车启动，我使劲敲窗，喊爸爸。他更是听不见了，只在茫然地寻找。我流出眼泪。列车员说，那是你爸爸？这个老头真好，他一直在那儿找你。听他这么一说，我简直要大哭起来。我恨我自己为什么那么机灵，一溜烟就上了火车，让爸爸到处眼巴巴地找我，算算时间，那碗滚烫的豆浆，他肯定没来得及喝。

我就这样哭了一路直到武汉。任何一次分离没有使我这样难过，爸爸日渐衰老的身影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也抹不去。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也是父亲，也是在火车站。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感受和他的一模一样。如果最初阅读这篇文章时就有同感，那么亲临其境就更引起我的共鸣了。人生悲欢离合已经够承受一番的了，那堪还伴以生老衰亡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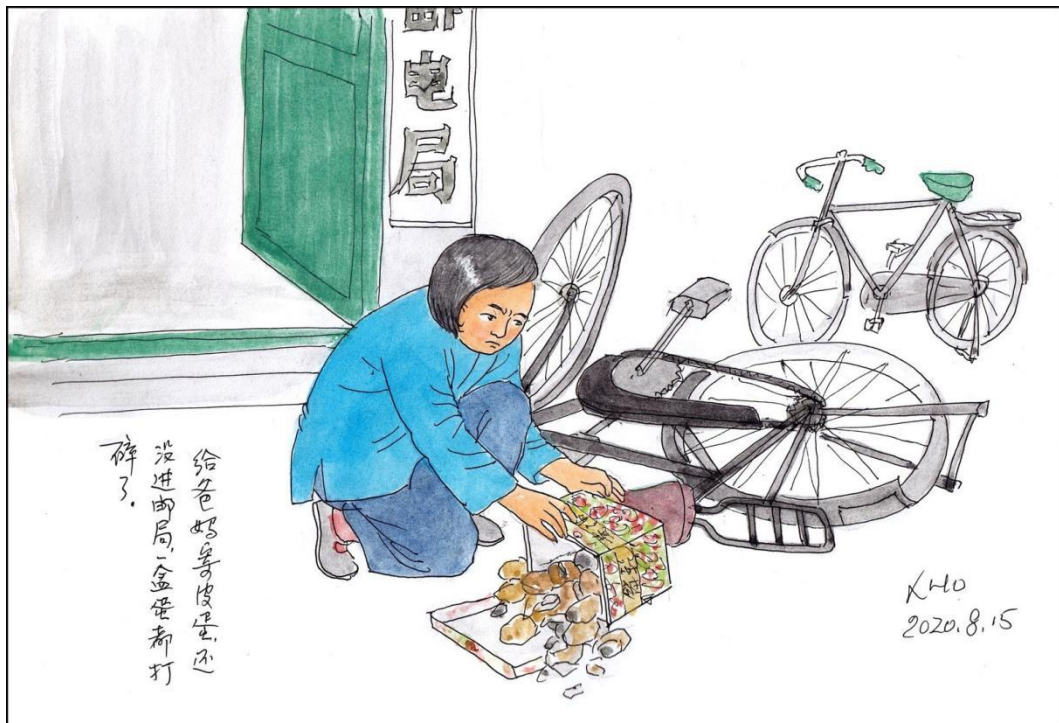
这件事又成了我一辈子中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每当想起此事，眼前就是爸爸眼巴巴寻找的样子，我都要流泪。



1971年的9月13日，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毛主席的忠诚战友接班人”林彪事件。紧接着下发中央文件揭露林彪旨在暗杀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听到此消息，看到文件，我背上的汗毛都竖立起来，虽说文革中一个个国家领导一天天被揪出来，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是阴谋篡夺国家领导权的野心家。但是唯一一个紧跟毛主席的，全中国人民众望所归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搞暗杀活动的恐怖分子，怎能不让人恐惧？我心中还有疑问，难道“明察秋毫”的毛主席对身边的定时炸弹竟看走了眼？很多事情是老百姓无法解释的，只好跟着一起“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我立刻偷偷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在干校的父母。他们很多人都有北京的亲人写信通风报信了，但是谁也不敢说，个个心照不宣。

林彪死后，干校好像皮球扎了孔，气慢慢地泄掉了，军代表早已不见踪影，刚去时虚假繁荣的劲头再也提不起来了。人们下棋打牌松快了许多，还有一个乐趣就是采灵芝。潮湿闷热的湖地很适合灵芝的生长，白娘子拼了性命采摘的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仙草这里俯拾皆是。每人都采了不少穿成串晾晒起来。爸妈回京时带回来一大串，像装饰物一样挂在家里。



干校对食物包裹也不加管制了。每个周末我的全部活动就是给爸妈买东西寄东西。我买了很多核桃，去壳取瓢，油炸后用糖炒，做成“琥珀核桃”给爸爸妈妈寄去。有一次我买了好几斤上好的皮蛋，小心地排放在一个铁的大饼干筒里，

周围塞上从农村买回来的稻壳，封好。到了邮局门口，刚刚支起自行车，突然哐啷一下子支架弹起，自行车摔倒在地，夹在车后座上的铁桶也狠狠地砸在地上。检查了一下，十之八九的皮蛋都摔碎了，与泥壳稻糠混合在一起，黑乎乎的一团。我又沮丧又不甘心，再买再寄。爸妈来信说，皮蛋怎么能寄呢？收到时全是碎的，已经发臭。

1972年的春节，干校很多人都回北京过节，只要有个理由就行。我给爸妈打了个电报谎称“克阳胃出血住院，速归”。我希望他们都能回来过春节，但是只有爸爸一人获准，妈妈回京得由妇联批准，出版社做不了主。妈妈也真老实，就乖乖地一个人留下了。克阳和刘元也回了北京，半家人好歹在北京过了一个春节。

1973年2月爸爸回到北京。不久妈妈也回来了。全家人挤在四合院西面的小跨院开始新一轮生活。

至1974年，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 【评论】

# 季羨林为什么造反

班道超

文革时，季羨林是北大东语系的教授兼系主任，系总支书贺剑城成了“走资派”，另一位教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季先生没有历史问题，不是专政对象。本来可以在躲在书斋里过小日子，做个逍遥派。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跳出来，造了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反。

季羨林造反的时间，他自己说是1967年的夏秋之交。他还说，他曾参加过一次北大两派大辩论的大会，在主席台上看到了副校长周培源。当时周培源已经是井冈山的总勤务员了。井冈山是67年8月17日成立的，周培源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当选为第一届总勤务员。季羨林参加的那个会议应该是在8月17日之后的一个多月。大约在当年的十月。

关于为什么造反，季羨林在《牛棚杂忆》里有详细的说明：

我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一派，做一个逍遥派是我唯一可造反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样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由，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想到快意处，不禁一个人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他认为掌权的聂元梓“心狠手辣”，“不愿意冒同她为敌的风险，我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做出一个中立的态度”（同上，页46）

但是，人世间决没见有世外桃源，燕园自不能例外。燕园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做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全校的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牛棚杂忆》页45）

是什么事唤起了季羨林的正义感，让他这个天生犟种，站在暴风雨之中了呢？是聂元梓和校文革在北大的统治。季羨林发现，聂元梓没有按党的教导走群众路线，他还发现，聂元梓是个极坏的女人，甚至还有血债——

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了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的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

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批号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面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同上，页46）

有了这个判断和印象，看到副校长、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也参加了井冈山，季羨林选边站队了。东语系总支书贺剑城记得——

某一天，我看到“地派”出版的小报《红干报》上，有季老的文章。由此我知道，他已倾向于一派了。后来我又在学生区看到一张讽刺“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通篇大字报上只画了一张《新北大公社入社申请表》，表上栏目有：姓名 / 王张氏，性别 / 女，年龄 / 95岁，职业 / 家庭妇女，嗜好 / 骂街。当时我不知它出自哪位高手，后来，“井冈山”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那是季老的原稿，他抄成大字报贴出去的。不久我听说季老正式加入了“井冈山兵团”，并且当上了九纵的勤务员。（贺剑城《亲历北大六十年》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页178）

其实，在加入井冈山之前，季羨林很犹豫一阵子，他权衡过利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理性告诉他，不能得罪人多势大的新北大公社。但是他感情占了上风。当时两派都在争取干部表态，站在自己一边。但是公社派的争取实在不得法，惹怒了季羨林，他的犟脾气上来了——

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有一些在前一阶

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之后，不知是什么原因，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有的也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我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有不少东语系的教员动员我参加学习班。井冈山的人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我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虽然我经过长期观察和考虑，决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来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两派各自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捧得像圣母一样。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这个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话必须说出来，心里才痛快，我对于两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这就给我招来了麻烦。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怎能还有什么办公室呢？但是，在我记忆中，确实是在办公室中会见了她们。我现在一时还想不清楚，以后或许能回忆起来）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O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时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我发现，我现在的处境几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样<sup>2</sup>。我有点不耐烦了。我曾说过，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越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我就这样上了山（井冈山）。（同上，页48）

---

<sup>2</sup> 季羨林这里说的老教授，指的是周培源。他在《牛棚杂忆》中讲过周培源上山的经过：“（周培源）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是党中央明令要保护的少数几个人中之一。他是怎样参加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井冈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从别人嘴里断断续续地听说，他不满那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逐渐流露出偏袒井冈山的情绪。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组织群众向他围攻；有的找上门去，有的打电话谩骂、恫吓。弄得这一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原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时，实逼处此，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干脆下海。立即被井冈山群众选为总勤务员之一。”（页44）

根据季羨林的叙述，我们可知，他上井冈山的原因和过程是：

第一，聂元梓的恶德恶行，激发了他的正义感。

第二，受周培源加入井冈山的影响。

第三，新北大公社的骚扰和威胁，惹翻了他的犟脾气。

文革时期，季羨林是北大教授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投奔井冈山被视为反聂反校文革反专制的壮举，尤其在他被封为“国学大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物之后。他的《牛棚杂忆》更受到舆论的追捧，成为反思文革的畅销书和权威之作。是耶非耶？读其书，观其人可矣。📖

2022-4-15

【怀人】

## 我的干妈包静安

张保和（美）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不但有特别好的父母，还有特别疼爱我的干爹，干妈。我的干爹，干妈都已去世多年。今作此文表达我作为干儿子对他们的思念和感激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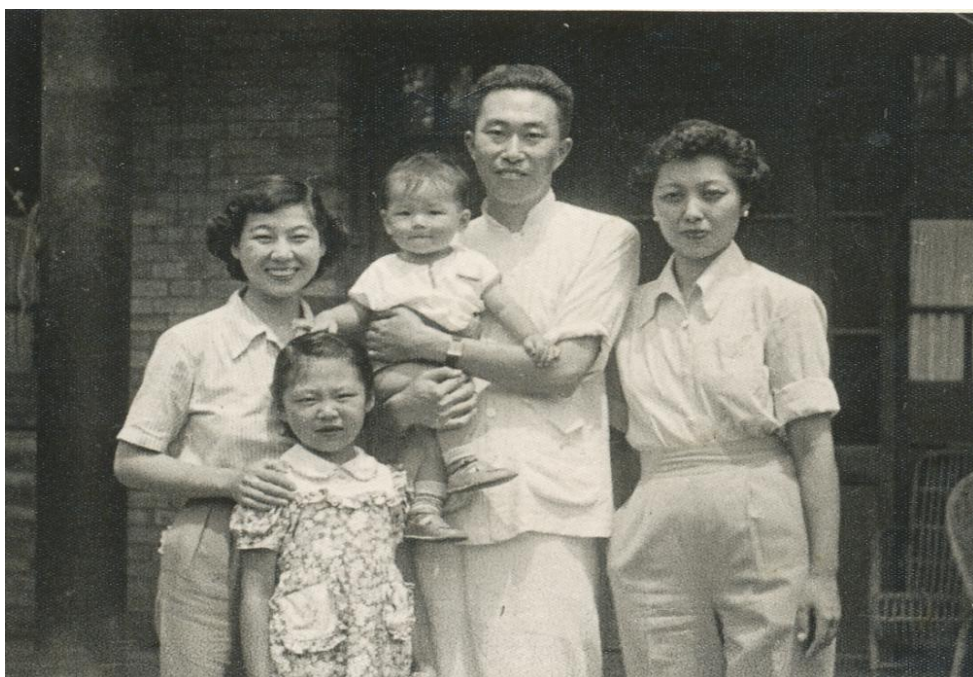
我的干妈名包静安，是最后一个内蒙古达尔罕亲王的第五个女儿，一个货真价实的公主，格格。说起达尔罕亲王，知道的人恐怕甚少，但提起孝庄皇后，大家可能就非常熟悉了。孝庄皇后是蒙古人，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嫁到清室的，而达尔罕亲王则就是科尔沁草原的王爷，孝庄皇后的娘家。因为皇太极以后的所有的清朝皇帝都是孝庄皇后的后代，所以达尔罕亲（50年代初的干妈）王家室被清皇室认作近亲。在清朝被封王不难，但只有清皇室的至亲才有可能被封为亲王，像恭亲王，庆亲王，肃亲王等，号称铁帽子王。这十几个亲王代表清皇室的最核心，是世袭的，而一般的王位则不然。

根据网上一些材料记载，末代达尔罕亲王的蒙名为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乐康，生于光绪五年（1880年）。因为他是内蒙古贵族的一个头面人物，抗日战争



时期，日本人多次试图诱他到伪政府任职，都被他拒绝。为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特授予他二级景星勋章。

末代达尔罕亲王后来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住在东城钱粮胡同的一所大宅子里。因怀念草原生活，他在他的院子里还搭了一架蒙古包。我母亲还记得他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一件趣事。那时，北京每家门口都被要求写上户主名字及职业。在他家的门前，职业就填写为“亲王”。1949，他去了香港，于1951年在港去世，终年七十一岁。他先后有过两房妻室，子女众多。后大多子女去了香港，美国，其中不乏有成就之人。但我的干妈包静安和另外一女儿选择留在了国内。



（以上是我在一岁时（1954年夏）和干妈照的一张相片。相片中，从左至右，我母亲孙靖，干姐姐金小曼，我自己，干爹金曾武，及干妈包静安。）

我的干妈长得特别漂亮。高高的个子，衣着华丽，风度雍容华贵，一举一动都显着贵族气息。我的干爹金曾武，出身于江苏吴兴商贾世家，父亲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北京派画家金北楼。干爹也是高高的个子，人特别和气。干妈，干爹生了两个女儿，金玲玲和金小曼（小名珑珑）。因为干爹的姐姐，我的干姑姑没结过婚，没孩子，玲玲姐姐就过继给了她。文革前，干爹在埃及大使馆当翻译，我和永和的英文启蒙老师，周伯伯，周妈妈同隶属于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经常在一起学习，很熟。

我干妈，干爹本住在北京钱粮胡同由干妈父亲，末代达尔罕亲王留下的豪宅。1949后，因政府不允许私人拥有大房子，他们搬到了南小街新鲜胡同的一处较小的宅子。那处钱粮胡同的豪宅后被刘伯承元帅所使用。

干妈和我的七姨孙芸是中学同班同学，关系特别好，和我母亲也认识。我父亲1949年从上海来北京后，也在一些社交场合认识了干妈。据说当初认我做干儿子的一个动机是我的干奶奶觉得认一个干儿子会帮干妈、干爹生一个自己的儿子。但是我的这个招子的任务显然没有完成好，因为干妈、干爹后来就没有再生过。不过这并不妨碍干妈对我特别疼爱。而我父母就自然而然地认了干妈的二女儿，珑珑，为干闺女。

在文革前，在我所住的北京东城王府井附近住有很多清朝皇亲贵族的后代。由于他们的家世，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大多数的人完全不同，都靠吃老本。但老本之雄厚，他们的收入根本不是当时任何工薪阶层能比的。我的幼儿园和小学同学中就不乏这样家庭的人。这使我想到了旧时英国的贵族社会，大家都以吃遗产为荣，如果某人需工作赚钱，则表示老本不够雄厚，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中国在1949年共产政权建立后，私有财产已经不受到保护，被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等运动一次次剥夺。恐怕那些吃老本的人也是提心吊胆。但在文革前，起码还有一些人可以吃。我的干妈，干爹就在其中。

我干妈家的收入都来自她的父亲留下来的在沈阳和北京的大量房地产的房租和我干爹的家产。他们过得是北京典型的皇亲贵族的生活。因为干妈，我有机会和那种生活方式有了一定的接触，使我开了眼。

首先，他们住的都是深宅大院。记得在金鱼胡同的东口有一些大宅院，本来是著名的那家花园，为晚清重臣那桐所建。1949年后，部分那家花园被拆了盖了和平宾馆，但在金鱼胡同东口的一部分还在，住着那家后人。那些院子非常大，虽是中式四合院，其中还有西式洋房，好几个佣人穿梭其间，和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相去甚远。干妈在新鲜胡同的房子虽然比他们在钱粮胡同的宅子小了不少，但也有前后两进，比起一般人的住房，还是要大最少几十倍。

他们经常去吃馆子。饭馆不外乎那些在王府井附近的饭馆，像全聚德，东来顺，翠华楼等。还有一个在东安市场里的和平西餐厅，也是大家喜欢去的地方。在那些饭馆里，最便宜的菜也要一二块钱，贵的则要好几块。所以一顿饭吃下来，少则十几块，多则几十块。当时的大多数的人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元。就像我家这

样的高薪家庭，去吃这样的饭馆也只能是偶一为之。而他们则可以经常去，甚至天天去。我每次去看干妈，她都要带我去吃馆子。有一次干妈请我妈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去东来顺吃饭，但没叫我，我就自己去了饭馆找他们。干妈看我来了，很高兴，就叫我坐下，大吃了一顿。

当时私人不能有汽车。干妈干爹出门都坐三轮车。但他们坐的比较一般北京街上的三轮车要考究，恐怕都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首先，三轮车都是双人车，还有棚子，车上还有大量铜活，并擦得锃光瓦亮。车夫也都穿戴得很整齐。车铃铛还特别好听。走到哪里，车铃铛响，非常神气。

那时候，干妈家里就有美国大冰箱。我记得干爹有一次说，有时候夏天太热了，就把大冰箱门打开乘凉，有点像现在的空调。相比之下，我家有一个土冰箱，每天需要到东华门一个冰铺去买一块冰放在里面，达到降温的效果。当然，那时的大多数人家连土冰箱也没有，对空调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



干妈的朋友圈都是当时北京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人。当时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有北京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头衔。他有两个太太。大太太梁君谟是我干妈最好的朋友，和干妈几乎形影不离。还有福芝芳，梅兰芳的太太，也是干妈的好朋友。干妈请吃饭时，梁

（干妈和干姐姐金小曼，小名珑珑——家父摄）君谟也经常在座。因为不常吃馆子，每次干妈请客，我总是狼吞虎咽，吃相恐怕不太好看。这时，干妈总是在一旁鼓励我，让我多吃。但梁君谟有时就会说，这孩子怎么吃那么多，好像我不太正常是的，弄得我不太不好意思，有点扫兴。

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每年春节，干妈都要给我10块压岁钱，再加满满一鞋盒的巧克力糖，够我和弟弟吃好一阵子。不过干妈宠我，也管过我。有一次，干妈一家和我们一家在八面槽翠华楼或王府井什么地方吃中饭，饭后两家人沿着王府大街向北走，好像是去沙滩的美术馆，因为我父亲喜欢在那里给亲戚朋友照相。我其实很少骂人，但那天不知怎么了，走到首都剧场门口时，在话中蹦

出来一句“他M的”，把我干妈吓了一跳。她忙说，小龙，你怎么骂人了？这可不好，把我弄得非常不好意思。这是她唯一一次批评我，让我终生难忘。后来到了内蒙，为了生存，自卫，开始学骂人，后来也精于此道了。这个习惯后又带回了北京，甚至带到了大学。会骂人成了在我身上的一个时代的烙印。

在文革中，像所有的皇亲国戚一样，干妈，干爹也受到严酷迫害。他们家被抄，人被打，财产被抢劫一空。他们家的主院被街道街委会占据，他们被轰到了外院的南房。不久，他们又被从他们的南房轰了出来，搬到了新鲜胡同一个大杂院里的几间西房。幸运的是，他们一家还都活了下来。干妈的好朋友，梁君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和乐松生的母亲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她的先生乐松生，同仁堂老板，则虎口余生。但由于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亲人，乐松生在68年春也自杀了。这真是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后来，有人将乐家老铺的故事拍成电视剧，“大宅门”，红极一时，一度成了中国人最好的娱乐消遣。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乐家的这段悲惨故事呢？到现在，只要一经过同仁堂，我的心里还总不是滋味。

文革后，那些皇亲国戚和吃老本族赖以生存的股息，房租，存款都没有了，财产又全被抄光，收入全无，使这些人的生活都变得非常困难，只能靠变卖残存家产和借贷度日。我干妈家当然也不例外。但在文革中，我们两家成了患难之交。当时大家都不敢来往，怕惹麻烦。我们家那时来往的客人也是很少，只有两三家，干妈就是其一。

一般人可能会想，像干妈，干爹这种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经过文革那么严酷的迫害，会变得低沉，悲伤。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坚强，乐观。我记得文革时饭馆都不卖考究菜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只卖些一，两块的大众菜。但即使饭馆里有好菜的话，大家也没有钱吃了。可是干妈会做西餐。我和永和每次去看干妈干爹，干妈就给我们做西餐。我记得她常做的菜有土豆沙拉，罐焖牛肉等。那时，色拉酱没得卖，需自己做。做的方法是用一个蛋黄，一边搅动一边慢慢加入色拉油，最后调成了稠稠的色拉酱。如打不好，蛋黄就泄了，就需重来。我妈做色拉酱时，就经常失手。但干妈做色拉酱从不失手。她的方法是用西餐的叉子在一个西餐盘子里伴色拉酱。一边伴，一边加油再一边加醋。她做的土豆沙拉我特别喜欢吃。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她做的土豆沙拉是最好吃的。

我母亲在文革中受到惊吓，一度有痉挛病。一发起病来，浑身痉挛，必须躺

下来，慢慢缓。虽然不常发病，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发病，也很危险。有一天，母亲在洗澡时突然发病。那时父亲上班，好像我家阿姨也不在，我和永和都慌了神，束手无策。这时，干妈正好来了。她将母亲从澡盆中抱出放到床上，让母亲慢慢缓了过来。

我的干姐姐，珑珑姐姐，和我关系特别好。。第一天去王府小学上学，我就去找干姐姐。她当时已是六年级了。她拉着我的手在学校里转转，让我那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干姐姐和我妈也非常亲近。我妈没有女儿，干姐姐就像她的亲女儿一样。在文革中，有一次新鲜胡同的一些小地痞找我干姐姐的麻烦，干姐姐就到我家避难大约一个星期。在其间，我和永和跟着干姐姐和她的一些朋友一块玩，非常开心。

在文革刚开始的一个时期，我父亲的工资还没有减，我父母还可以在经济上接济干妈他们。到大约1968年后，我父亲的工资也被减，变成拿生活费了，就不能接济他们了。1969年八月，我去了内蒙，一个月工资5块钱，但第一个月发了双份，10块。我就将五块钱寄给了我妈，另外的5块寄给了干妈。

因为干妈的父亲的身份，本应受到政府民族政策的照顾。后干妈反复写信向政府申诉，甚至直接给周总理写信申诉，经历了长期交涉。在那段时间里，干妈经常到我家谈起这些事。尽管过程非常曲折，困难，永和记得干妈还是不屈不挠，且非常乐观。大约在1971年，政府终于将抄走的财产发还给他们，虽然她在北京和沈阳的房产从来没有发还。不幸的是，因分配归还财产引起的家庭矛盾，加之多年的生活压力，干妈在发还不久后就得了精神病。从此病情一直没有什么好转。干妈在1976年由于糖尿病去世。

按政策，他们的新鲜胡同的房子也应立即归还，但街道办事处就是赖着不走。在干妈去世后，经干爹，干姐姐长期交涉，终于在199?年将居委会最后请出了他家。但房子早已破败不堪。回到老房子后，干爹非常爱动物，在家里养了很多狗，最多时达七八条。那些狗都是从大街上捡来的。其中一条白狗，好像叫大白，捡回来时因被车撞着已经快死了，但后来不但活下来，还活了很多年。每次到他家，当干爹或干姐姐出来开门时，一大群狗也会跟着狂叫而出，颇有点吓人。但它们只是叫叫而已，绝不会伤人。干爹还养着一只刺猬，平常都是躲起来，很少露面。这还不算，干爹还买大量的鸟食喂野鸟。一到喂鸟的时候，小至麻雀，大至乌鸦，都纷纷落到他们的院子里觅食。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能看到那么多鸟，

也是一景。

有时从美国回北京，我就住在干爹家。干爹，干姐姐也都精于烹饪，且中西餐贯通。每次回国，就像干妈在世时一样，干爹，干姐姐都会带我去吃馆子，加之给我做一顿非常丰盛的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次春饼席。春饼是一种北京特色菜。我家阿姨徐阿凤做的都是上海菜。虽然她后来也学了一些北方菜，但种类不多。在这之前，我只吃过简单的春饼，即薄饼包烩菜。那次在干爹家，吃到多种配春饼的菜，如酱肉，京酱肉丝等，让我开了眼。干姐姐的拿手菜是粽子，特点是料足，味又好。不管是豆沙粽或肉粽，都要放少许猪油，特别好吃，是我吃到的最好的粽子。由于我家是南方人，很少吃北京的一些地方小吃。在一个冬天，干爹还专门带我吃了一次羊杂碎汤。虽然我不太习惯羊肉的味，但在冬天吃确实很暖身。我的干爹于1997年去世。

我干妈和他们的朋友们是中国最后的贵族，享受在那个时代里极少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财产都是他们的祖先留下的，他们自己则与世无争。到了文革，通过抄家和其他手段，私人财产就被洗劫一空了，从此，吃老本的生活方式就在中国消失了。不过，在最近的改革开放中，又出了一批新贵，吃老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好像又时髦起来。不过如果国家没有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也不知道这批人能维持多久。

在美国，通过书籍，影视，也接触到一些英国历史。英国在过去几百年里，有一独特的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即财产只可传给长子，次子及女儿都没分。如没有儿子，财产就要传给一个同族中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这个法律的弊端显而易见，但好处是遗产都集中在一个继承人手中，使大多数的英国的古老庄园都保留了下来，到现在成了英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年美国有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是讲20世纪初一个英国贵族家庭的故事。其中对遗产继承的问题有特别生动的描写。剧中主人翁考利伯爵膝下无子，只有三个女儿。所以必须到外面找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同性远亲马修来继承这个庄园和他的爵位。一旦伯爵去世，整个伯爵家人就要搬出庄园，落到无处栖身的地步。幸好马修和伯爵的大女儿玛丽相恋结婚，总算解决了伯爵家的燃眉之急。但马修，即伯爵的女婿，又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但运气又一次落到了伯爵身上，因为那时马修和伯爵的大女儿已有一男孩，于是那男孩就成了伯爵的继承人，让伯爵家人免于将来流离失所。后来伯爵的二女儿伊迪

丝和一没有财产的平民恋爱。就在快结婚前，那人的一个拥有侯爵爵位和很多财产的亲戚死了，而根据上面所提到的英国法律，他的爵位和财产都传给了伊迪丝的未婚夫。这样一来，这个婚姻的平衡马上就变了，从贵族下嫁平民变成贵族高攀更高贵族，使这桩婚事险些流产。这个电视剧的情节都是虚构的，但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英国贵族当然没有了昔日的财富和特权。但他们的爵位还被保留着，他们还是很被人尊重，在某些正式场合下还被人们以他们的爵位相称。他们也还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英国的议会由两院组成，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和贵族院（House of lords）。贵族院就是由贵族的代表组成，它没有实际立法权，但有权向政府提出质询和建议。在英国，贵族院的讨论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旁听。我们在2019年春在伦敦旅游时，就曾去在泰晤士河边的英国国会旁听贵族院的讨论，借以体验英国的政治生活。

在经济上，大概除女王家族外，英国大多数的贵族也平民化了，需自食其力。他们祖上留下的豪宅并没有被没收，但那些房子都是又老又大，使用及维修费用极高，在从前，这些产业是靠贵族的高达几千英亩的领地的收入来维持。现在领地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必要的经济资源去维持它们。当然最简单就是将其卖掉或捐出去。但这些房子都是家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祖产，很多贵族还是尽量去保留它们。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其豪宅变成博物馆，向大众开放，用门票收入补助房屋使用及维修的费用。

从各个方面讲，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一个更为平等的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英国走了一条较平和，非暴力的道路。相比英国，中国则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自从1949年以来，传统中国文化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国的前朝后人所代表的那部分中国文化遗产当然也在被破坏之列，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物质上，甚至肉体上，被系统的消灭。而更可悲的是，这些暴力并没有帮助中国达到一个较平等，文明的现代社会。

这让我想到我妈的一个同学岳维珍（1922~2009）的遭遇。岳维珍的先生姓张，也是前面提到的清末重臣那桐后人，她自己也是大家闺秀，文革前住在王府井八面槽西堂子胡同的一座宅院里，由于那桐留下的财富，他们的生活极为优越。岳维珍有四个子女，一个男孩，张之元，和三个女儿，张宾，张玥，张琰。其中张宾是我的干姐姐金小曼在王府大街小学同班同学，而张琰是我弟永和王府大街

小学同班同学。在文革前，我记得我妈有一次带我们到她家做客。后来她的张姓先生在文革中受不了红卫兵的酷刑，吃安眠药自尽。岳维珍自己也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为了孩子，她坚持活了下来。但家中的财富尽失，都被红卫兵掠走。她一个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将四个孩子培养成人。岳维珍的二女儿张玥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这段经历，纪念他们的母亲，非常感人。起码在我的心目里，不但在财富上，也在毅力和精神上，岳维珍都达到了一个真正的“贵妇人”的境界。

位于北京东城八面槽的金鱼胡同和西堂子胡同是两条紧挨着的東西向的胡同，就在王府井北口。东安市场就在金鱼胡同西口路南。金鱼胡同有很多豪宅，都是前门开在金鱼胡同，后门就在北边西堂子胡同，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那家花园，是北京最大最好的一些四合院。那家花园在五十年代就被拆了盖了和平宾馆，有些金鱼胡同的豪宅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被拆毁盖了旅馆。偌大个北京城，非要将北京最好的四合院拆了盖旅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也使我想起了我父亲生前在保护北京古建筑做出的诸多努力，虽然只是螳臂当车。

49年后，北京大多数的四合院都成了大杂院，被毁得千疮百孔。而改革开放的拆迁又是另一大劫难。到现在北京保存较好的，较大的四合院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了，干妈的新鲜胡同的四合院应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房子也几度听说要被拆迁，但都没有兑现。这可能得益于某一政府高官在他家的紧隔壁建了一幢新的四合院。近几年，我的干姐姐和她的儿子花了不少精力和钱修缮他们老房子。他们也还住在那里。

几乎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告诉我，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干妈，干爹，他们就是常来我家的父亲的同事，郝凤德，陈红娇夫妇。这使我大吃一惊。郝凤德，陈红娇夫妇是父亲在北京最早的同事。他们和同在设计院工作的丁用宏是好朋友，而我母亲是丁用宏的表姐。他俩和丁用宏一起把父亲介绍给了我母亲，所以他们是我父母的媒人。他们没有孩子，所以在我出生后，就顺理成章成了他们的干儿子。后在反右运动中，我父亲和他的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包括郝凤德，陈红娇夫妇，丁用宏等，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除了我父亲外，其余所有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父亲其实也被内定为右派，准备最后当做压轴戏给揪出来。但到了最后，上面忽然下了命令，把我父亲给免了。现在想起来，这个反高潮的结果本身非常有戏剧性，到现在具体的原因也不清楚。一种说法是因为我父亲被内定负责庆祝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中的两个或三个项目，当时政府的最上层说了话，让



我父亲幸免于难。无论如何，事后，我父亲必须和他的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事划清界限，以避反党小集团之嫌。所以这桩干亲就只好不了了之。

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果非常严重。除了政治上受到批判，工作上受到歧视，除了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外，还要被降职降薪，使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生活非常困难。现在较保守的估计是有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是对中国知识精英一次极大的打击。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问我的父亲他是不是右派，他回答说，不是，如果我是的话，你们（指我和我弟弟，永和）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意思是说如果他被打成右派，他也会被降职降薪，我们家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艰难了。

郝叔叔是一个非常和善，正直的人。他在1997年访美时，曾到我那里小住，我还陪他去迪斯尼乐园玩。因为郝叔叔是建筑防火的工程师，他托我帮他定了美国的建筑防火杂志带回国去。其实他那时已经退休，可还对他的专业那么用心，显示了他的敬业精神。

我和郝叔叔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在我父亲去世到我家看我母亲。我们那次聊了很多。我本来希望有机会再和郝叔叔多聊聊，了解我父亲在工作上的事情。可是在我父亲去世没多久，就传来了郝叔叔过世的消息。他在一次行走中不幸摔倒，伤及头部不治。郝叔叔不过才七十几岁，非常可惜。他的太太陈红娇阿姨后搬到一养老院居住。前两年，我还和她通过一次电话，聊了很久。上面所提的关于反右的事情，大多都是她那次告诉我的。但从那次谈话后，就没有和她联系过，不知她近年情况如何。

我有个蒙古干妈。后因上山下乡，到人烟稀少的内蒙草原上摸爬滚打近六年，对我的性格和思想有很大影响。我在内蒙的经历使我在文化上，感情上，和干妈更有亲近感。干妈，干爹的爱给我的生活，尤其是我的童年，不但增加了不少乐趣，享受，也使其更加丰富多彩。他们坚强而乐观的性格应是我的一个榜样。我的干妈笑起来，非常独特。到现在，她的笑声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干妈的笑声及干妈，干爹给我的美好记忆将陪伴我的一生。

干妈生于1920年，今年应是她100周年诞辰。特作此文，予以纪念。📖

2020年5月31日

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口述】

## 历史所三十年（上）

### ——《上班记》选载（二）

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

#### 1. 红旗单位“反右”

1956年我调到历史所，不久就赶上“反右”。不过历史所还好，一来受中宣部直接领导，公认的红旗单位。二来也有保护名人的考虑，全所一百多人只抓了五六个右派。比如顾颉刚先生并不在其中，后来他自己还贴大字报，自命“漏网之鱼”。

其他单位也有知名人物没戴帽子的。比如“鸣放”<sup>3</sup>时候，华罗庚参加了六教授的发言，联合署名发表了文章。后来那六个人，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等等都是右派，华罗庚不是。历史所的名人里，只有副所长向达先生一个是右派，因为他在“鸣放”时候发言，引了一段魏默深（魏源）的话，批评时下的假话成风。向先生的性格非常倔强，1964年自费到广州去看陈寅恪，这种事情别人是不会干的，可他就要去做。文革初期，把他发配到十三陵劳动，病很重也不去就诊。其实，开头时候不是很严重，可他始终不去看，就这样死掉了。

1957到58年间，对知识界的批判是不断的。比如批人民大学的尚钺，那是位老资格的学者，我想他现在大概已经去世了，不然也一百多岁了。当时历史学界有个热门题目，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具体时间。因为《毛选》里说，自从周秦以来，中国就是封建社会了<sup>4</sup>，这是我们的标准提法。但周朝八百年，再加上秦朝，《毛选》里并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所以就成为了历史学界的一个热门题目。尚钺的提法是从魏晋时候开始，现在北师大的何兹全也是这个提法。但在当时，这是违反最高指示的，所以就批尚钺，大家纷纷写文章。再一次是批哲学所徐懋

<sup>3</sup> 1956年颁布“双百”方针，即学术、艺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春扩大到政治领域，发动群众提意见，允许对党、对政府公开批评，简称“鸣放”。但随着言论的尖锐化，超出了毛容忍的底线，转而成为“引蛇出洞”，55万人被划为“右派”。【港版额外加的】

<sup>4</sup> 参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毛选》第二卷，第5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根据1966年7月横排本重印）。

庸，过去他是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诸如此类的批判一波接一波，历史所给大家分派任务，我的任务是批雷海宗。

雷先生是我的老师了，我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主任，解放后调到南开去了。雷先生一贯的观点认为，奴隶社会不是古代的主要社会形态，并不占主要地位。他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奴隶社会和“五种方式”，于是就批他。我对奴隶社会并没有研究，不知道从何下手，就在他以前的作品里抄了几段，加了批语交上去。后来我们党小组的小组长来找我，他是学术秘书了，向我道歉，说：“批雷海宗的那篇文章你有底稿吗？”解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把我的稿子给弄丢了。当然我也很安慰，并不是说学生不可以批评老师，而是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像样，丢了最好。所以批右派时候，我就不用再写文章了，在天津批判雷先生的大会也不必参加了。

在当时，不仅老一辈知识分子受冲击，青年右派也非常多。有一次中科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批斗会，其中一个才19岁。这么年轻，是什么问题呢？1954年时候，公布了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国家主席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比如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年满35周岁等等。这个年轻人就在日记里写：“国家主席必须年满35周岁，今年我才19岁，得等多少年呢？”如果是在美国，年轻人有了这种想法会得到赞美，认为他有出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日记被人发现了，就说他是野心家，想当国家主席。

那次批斗会上还有一个青年右派，是物理所的项志遴，才27岁。他的家庭成分非常好，几个哥哥、姐姐都是革命的，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社科院的院长胡绳（原名项志遴）。项志遴的功课好，早年被保送去苏联，可是到了以后发现许多问题，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我现在思想变化很大，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分手。”他在日记里还说：“世界文明的进步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全归功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党派。”其实这话是有针对的。时代的进步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退步也不能全部归过于某一个人。但苏联把全部的成果都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斯大林，他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项志遴属于真正有思想理论的右派。

当时还把他的材料发给大家看，在这一点上，“反右”前后的批斗会有所不同。以前斗某某人的时候，一般都会把材料印出来给大家看。比如他说过哪些不

好的话、写过哪些日记等等，可是后来渐渐就没有了，据说这是吸收了土改的教训。土改时候斗地主，起先还让地主说一说。结果大家听了以后，又开始同情地主，效果很不好，所以后来就不再让地主讲了。斗项志遴的时候也是，他的那些材料本来是供批判用的，可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且类似的情况很多，所以后来一直到文革，批斗会就不再发材料了，叫作“避免放毒”。任凭随便什么人来批，又不许辩护，于是就开始了胡编乱造。

## 2. 从“大跃进”到饥馑

“反右”过后是“大跃进”，从1958年开始，现在看来是胡闹了。不过我想，毛当时确实有一个很浪漫的想法，资产阶级几百年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到。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三面红旗，强调“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规模大、公有化）、“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徐水公社吃饭不要钱，《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吃饭不要钱，古今中外谁见了。<sup>5</sup>现在我们还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那时候的《人民日报》上就写着：看来共产主义已经离我们不远了。<sup>6</sup>

我猜想，毛是用这些办法来论证自己的正确：你们这些右派总说我们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你看我们马上就可以“十五年超英、五十年赶美”！1956年毛在八大上有一次讲话，收在《毛选》第五卷里，说：我们号称是社会主义，据说有点儿优越性，如果五六十年之内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从地球上开除我们的“球籍”。<sup>7</sup>听起来也是斩钉截铁的。

可是到现在，已经满五十年了。我们人均产值只有一千多美元，台湾一万六，美国是四万。<sup>8</sup>不但没有超过，而且远远的落后，要这么说的话，应该“开除球籍”了。

<sup>5</sup> 1958年至1960年间，有关“吃饭不要钱”的报导屡见报端。《人民日报》将其作为标题出现的，包括1958年10月8日第三版《吃饭不要钱以后……》，10月10日第八版的赞诗《吃饭不要钱》，10月24日第八版《论吃饭不要钱》等。诗人徐迟在赞诗中写道：“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sup>6</sup> “大跃进”期间，关于“社会主义新世界欣欣向荣”、“帝国主义旧世界已经日落西山”，社会主义具有绝对优势，必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面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共产主义制度无往不胜”等等，此类文字屡见报端。

<sup>7</sup> 参见《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毛选》第五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77。

<sup>8</sup> 约为2005年的数据。

凡是伟大的理想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国。比如柏拉图、孟子，一直到近代的康有为写《大同书》。毛也是这样，他的理想国就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每个小单元都自足自给。其实这是很落后的小农思想，而现代社会是要专业化的合作生产，都要相互依存的。

我有一个同学叫关崇焜，中学、大学都在一起，后来他在交通部做总工程师。有一次跟我聊天，他说：“越是现代化，就越不是自足自给。”比如波音公司造飞机，它的拳头产品是发动机，那是自己制造的。但精密仪器用的是德国、瑞士的，电子零件用日本的，因为这样最经济，性能也最好。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这是最高效率的组合，越是现代，越要讲求分工合作。那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开头就讲分工的必要，但我们却追求每个公社都自足自给。什么都做，什么又都不能做精，那只能是一种很落后的、中世纪传统的生活。

在江西的时候，有人批评过毛，说他是落后的农民思想。我想确实也是这样。毛设想的世外桃源式的理想国就是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每个公社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食堂、医务室、幼儿园，甚至办大学，一个公社就是一个单细胞，这就背离了现代社会进步的法则。比如历史所，不过才二百人，还有自己的电工、木工。可是电路不会天天出毛病，临时找人做就可以了，那不比三百六十天养一个人经济得多？而我们呢，本来是研究历史的，结果每个人都按全能型要求。今天让我们干农民的活、明天干工人的活，其实都是不务正业。

毛本人有很多浪漫的想法，真的以为只要革命加生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做得出来。《人民日报》天天报道，哪里又亩产超过了万斤，我想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怎么能从以前的亩产几百斤，一下翻到了多少万斤呢？前几年报纸上说，袁隆平做试验，已经达到亩产800公斤，下一个目标是再用五年达到900公斤。可我们在“大跃进”的那几年，早就已经亩产多少万斤了。我想，那时候有很多人知道是假的，不然都亩产万斤了，怎么会还吃不饱？

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毛是真正相信的。有一次报道，说毛到河北视察，和农民座谈，说：“你们有这么多粮食，吃不了打算怎么办？”农民回答说：“吃不了我们换机器。”毛说：“不要换机器，你们将来可以三分之一休耕，三分之一

园林化，另外三分之一种粮食。”<sup>9</sup>我想他既然这么说，大概就真是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认为是“大跃进”成功了，共产主义真的不远了。哪里会想到，马上就要闹全国性的饥荒，所谓的“三年困难”接踵而来。

1950到52年，我在北图工作，一个月工资有五六十块钱。那段时间物价非常稳定，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到1954、55年就开始紧张了，买肉排长队，而且排队也未必买得到。1955年以后，供应越来越紧张，粮食一减再减。最紧张的时候，我一个月领29斤半的粮票，就是说，限制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鸡蛋论户配给，每户每月有两斤，大约十来个。如果按一家三四个人计算，平均每人每星期有一个鸡蛋，而且还不准用油煎——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的油，炒两次鸡蛋，这个月油也没的吃了。没有菜、没有肉，一切副食、零食都没有，全指着这一点定量供应，这哪能吃饱？

我家住在西什库教堂对面的惜薪胡同。明代的皇城里有十三个司，“惜薪司”是其中之一，大概是放柴炭的那么个地方。胡同口上有一个卖菜的商店，1959年或者60年，有一天早上我去买菜，可是什么都没有。我走了一站地到西四菜市场，也是空的，于是又走两站地，到西单菜市场。那是北京市内最大的两个菜市场之一了，另外一个东单菜市场。到了以后大失所望，只有架子上摆了两棵白菜，想买？对不起，不卖，那是样品。没办法，只好又从西单走回来。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十岁，按说年纪不算大，可是身体总吃不饱，路都走不动。不过才走了半个多小时，觉得累得要命，回到家里就想躺着。而且，转了老半天一无所获，好像打了败仗一样，心情颓废极了。

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我住在城里的四合院，有一个邻居是我的中学同学，当时做小学教师，我住西屋、她住北屋。一天早上起来看见她，忽然发现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其实是浮肿了，让我心里挺难过的。过些日子慢慢好了，可是没几天，忽然又变成了一个大胖子。这对健康的损害非常厉害，怎么吃得消？她的女儿是个高中生，一天从医院回来，我问：“二妹，你什么病啊？”她倒挺干脆，说：“大夫给看了，说没病，就是饿的。”

再比如，我们组有一个同事叫牛继斌，家里孩子多，生活挺苦的。每天中午

<sup>9</sup> 1958年8月上旬，毛视察河北，听了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毛很高兴。在当月30日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指出：将来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耕。”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下班，他比别人走得都晚，拿一个口袋在树底下转悠，拣一包嫩的叶子带回家吃。我小的时候吃过藤萝饼，一种紫色的小花，烙在饼里再加些糖，非常香。但那是吃着玩的，怎么能当正经饭？以前只是听说，人饿极了就啃草根、吃树皮，没想到亲眼见到了摘树叶子吃。北京城里尚且如此，外地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我那时候四十岁上下，身体也有毛病，不过问题不大，只有两样感觉非常明显。一是走路，多走几步就觉得累得要命，好像刚跑完了马拉松一样，回到家里就想躺着。另一个感觉是看书。有时候眼前突然就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好闭着眼睛等，过十几分钟又好了。我不知道什么毛病，问一个懂医的人，他说没别的毛病，就是营养不良，吃饱了就没问题。

后来实行了一种办法，分成几个级别实行配给，级别高的可以供应好一点。给我配的是乙级，每月有半斤黄豆，一斤或者半斤白糖，大概还有点儿别的。另外，当时除了粮票，还有布票、工业券，也都是配给，就表示这些也不能正常供应了。每年限用十几尺布，文革时有一年布票涨了几尺，大家还要感谢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感谢它给我们涨了几尺布。

历史所一年可以分两辆自行车，几十个人去抽签，好几年我都没轮上。不过有一次我抽中了，是一张八块钱的塑料布，买回来铺在桌子上。其实我想，那塑料布八毛钱的成本都用不了。不过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能买到就很高兴了。所以只要有会，不管是什么东西，也不管有用没用，大家就都抢着去抽签。

困难期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自然灾害，二说是苏联逼债，不过我总不太相信。当然，以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会几万里都风调雨顺，总会找出几个自然灾害的地方。但那几年，似乎没有特别大的灾情。北京市长彭真有个解释，说：去年“大跃进”高产，什么什么多用了一点，什么什么多用了一点，结果大家反而不够吃了。<sup>10</sup>这个说法好像也说不过去，粮食多了首先要给人多吃点，怎么能首先干了别的？

包括我家在内，许多家庭特意准备一个秤。每次做饭前先称份量，不要今天煮多了，月底没的吃。而且我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有的家庭是每个人分吃的。据说乡下饿死很多人，具体我不清楚，但城里一连三四年家家都吃不饱，这是明

<sup>10</sup> 无从考证。周恩来曾在讲话中说：“粮、菜、肉，去年农村多吃了一点，现在只好少吃一点，要在三个月内不吃肉。”（1959.5.11）又曾致信中央，道：“……明确讲去年农业确实大丰收、大跃进，但由于一时吃多、用多、花多了，今年才出现一时、一部分物资不足的现象。”（1959.6.1）等等，是为旁证。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26、2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摆着的。所以，倒是那几年政治上比较缓和——劲都没有了，哪还搞得动？

### 3. 三年调整

1959年，毛从第一线退下来，理由是免除一切具体的工作，可以集中精力考虑理论问题。于是刘少奇上去，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农业几十条、工业几十条、教育几十条等等。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只不过比较实事求是，要按规矩办事。

比如有个办法实行了一阵子，要保证每周的“六分之五”，就是说，每周要有五天干业务，不要总是成天的不务正业。再比如“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我小时候在北京，那还是解放前了，商店服务员的态度都非常之好。他们有一句口头语，“进门就是财神爷”，凡进了商店门都是来花钱的，所以他们的态度非常好。可是解放后不一样了，卖多卖少和售货员完全没有关系，买东西的人就像吃嗟来之食一样，大家伙都排着队等他施给，所以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恶劣起来。刘少奇搞“自负盈亏”，亏了、赚了都是自己的，一下就把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态度马上又不一样了。农村也是这样。一直到1964年我们下乡“四清”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见大部分的麦田都稀稀拉拉，唯有一片长得格外好。我觉得很奇怪，旁边一位同事就说：“您放心，那就是自留地。”

刘少奇的这些办法，用后来文革的术语讲，就是“乞灵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过还是很有效的。经过三年调整，中国经济又慢慢缓过气来，生活上的供应也好了一些。记得1963年到上海出差，我在南京下车待了一天，找到住处后到玄武湖闲逛。一出挹江门，就看见一个摆摊的小贩卖炒花生米。我有好几年都没吃花生米了，一看见就忍不住，给了他两毛钱。没想到买了那么大一包，一路走一路吃，非常高兴，晚饭都给省了。

自己没搞好，别人上来又搞上去了，眼看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起了作用，我想这件事对毛一定有影响，心情总是不愉快的。薄一波有个回忆录，里边提到1962年初人民大会堂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有个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讲话，说：“我们遇到了困难，有人说是天灾，有人说是人祸。要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话，仔细想想就有问题。天灾没办法，只能由老天爷负责，但七分人祸是谁造成的？总得有人负责吧，所以刘的话是很犯忌的。后来，林彪也在会



上做了发言，当时他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说：“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他的指示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没有搞好？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领会、很好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所以才出了问题。”<sup>11</sup>薄一波在回忆录上似乎暗示，毛听了这话非常高兴，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用林取代刘。我想，这一点可能是真的。

中国历史上，汉代以后，历代都是异姓不封王，只有少数例外，郭子仪是其中之一。郭子仪平回纥，危难之时再造社稷，一生战功无数，功劳特别大，所以封了汾阳王。史书上赞美他“功高震主而主不疑”<sup>12</sup>，这句话是很值得揣摩的。有一出戏叫《打金枝》，代宗皇帝把公主下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郭子仪过生日，众多儿子、儿媳都来拜寿，唯有公主不去，说：“我是金枝玉叶……”郭暧非常生气，说：“没有我爸爸，你爸爸做得了皇上？”然后就把公主给打了。郭暧这话非常大逆不道，就像反党、反领袖一样，是最大的罪状了，于是郭子仪绑了他的儿子上殿请罪。又比如曾国藩，太平天国打下了差不多半壁江山，清王朝眼看就要垮台，已经准备要退回东北去了，多亏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功劳之大可想而知。据说有人劝他再进一步，但在这一点上，曾国藩自始至终非常警惕。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都是“功则归上，过则归己”，这是维护皇权绝对权威的一种办法，也可以说是政治学上的常识。可是刘少奇在这一点上似乎并不懂得韬晦，没有做好。

比如那几年，每逢国庆，《人民日报》上都是两张主席照片并列，这边毛泽东、那边刘少奇，平行着放。<sup>13</sup>可是，绝对权力只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最高领导只能是一个，怎么能并排贴出两个主席？后来林彪就很注意这一点，包括那些走路的照片，都是他跟在毛的后面，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再比如，现在我们在外交礼仪上和国际接轨了，国家领导人出访都按照国际惯例，可以携夫人同往。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先例，苏联也一样，斯大林就从来不携夫人。可是刘少奇出国要带上王光美，非常的风光，等于摆到了第一夫人的位置上，江青会怎么想呢？而且，刘少奇还带王光美在全国巡讲桃园经验，赞美说：“她有这个经验，我们没经验的讲不出来。”<sup>14</sup>有句话叫“六亿神州

<sup>11</sup> 大意如此，薄道：“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45-10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sup>12</sup>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语出《资治通鉴》。

<sup>13</sup> 195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并排刊发了毛泽东、刘少奇的标准像，从此成为惯例，直到文革开始。

<sup>14</sup> 无从考证。1963-1964年间，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蹲点“四清”，作了一份关于“桃园经验”

尽舜尧”，既然那么多的舜尧，何必一定要让自己的夫人出来？现在我们知道，江青是个喜欢嫉妒的人，为这件事情，她的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呢？

权力斗争面前，即便是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也毫不客气，更不要说对旁人了。唐玄宗被赶到四川，回来以后他的儿子已经继了位，父子之间非常紧张，好几次差点闹出大悲剧。西太后出于私心立光绪，以为她妹妹的儿子就最保险了，结果也是闹矛盾，没有丝毫的缓和余地。可惜刘少奇不像毛那样熟悉中国历史，不懂得“功高震主”是很遭忌的事情。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华盛顿。有人鼓励他做皇帝，可是他做了两任总统以后，怎么劝也不干了，这是个例外。至于其他人，比如拿破仑就要终身执政，然后做了皇帝，袁世凯也是终身总统，最后还是要做皇上。我们也有宪法，可那是纸面上的，并没有一种体制能够保证最高权力不受制约。比如宪法上规定，国家主席由人大选举，罢免主席也应该经过人大表决等等一套合法的程序。可是刘少奇，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下去了，并没人把宪法拿出来做依据，要求依法办事。

自此以后，空气越来越紧张。“三自一包”等等全部取消，认为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到下面的层层领导，政权都有资产阶级坏分子在把持，阶级敌人无处不在。最高指示要我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sup>15</sup>，任何问题都上升到这个高度，叫作“上纲”。甚至你穿了件新衣服，都可能被说成要变“修”<sup>16</sup>了。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厚，阶级斗争逐渐变成了最根本的、压倒一切的任务。

#### 4. 下乡“四清”

从1962、63年起，政治气氛逐渐升温，先是从文教界开始。比如批判“鬼戏”，批判电影《舞台姐妹》，批判中间人物。说文学作品总写那些中不溜的人物，

---

的报告。刘少奇认为，这是“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有普遍意义”。经毛批示后，此一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600-6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sup>15</sup>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开幕会议上，毛说：“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152页。实际上，毛本人没说过“天天讲”，但此一说法广为流传。

<sup>16</sup> “修正主义”之简称，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篡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19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被毛认定是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这个词被滥用，也指生活中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作风”。

既不是最先进的，也不是最落后的，所以要批判。对外是“九评”<sup>17</sup>批赫鲁晓夫，主要目的还是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说是“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的身边”。曾经我在一份权威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提法，当然也就是一笔带过了，说：现在回头看“九评”，说的不过都是些空话。<sup>18</sup>

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说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为了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我们“九评”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提出没有和平过渡，而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是毛的一个基本想法，所以就是要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是国家总也上不去，连温饱都谈不上，甚至吃一块豆腐还要限量。我想，这是他当政二十几年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矛盾。

1964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不久，历史所下到山东海阳县搞“四清”。最高指示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sup>19</sup>，于是先天就认定，农村这些领导干部中有那三分之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作祟——毛很有意思，总能说出个数字的估计。比如“95%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sup>20</sup>等等，不知都是什么根据。其实，这是先有结论的调查方法，明摆着的不合理，我们也无可奈何。

下去之前，在济南集中学习了三天。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给我们做报告，其他的话我都忘了，只有一句始终记得，他说：“这次你们下乡，可要注意老百姓的生活，不能再像‘大跃进’那样，不顾人民的死活。”真乃仁者之言，至少他肯说真话，这就很不容易了。但问题是：压力来了，谁能顶得住呢？

最糟糕的是攀比成风。比如抓贪污，哪个乡都抓出一大串，一贪污就是几千斤粮食，我们却一个都没抓着，怎么交账？按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贪污应该很安慰才是。但“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你不抓他，那就整你好了。于是，我们就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农村干部的审察。而且问的时候还不叫“贪

<sup>17</sup> 20世纪60年代，中苏“十年论战”，旷日持久，关系降到了冰点。其中，1963年9月至次年7月间，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论战文章，统称“九评”。

<sup>18</sup> 无从考证。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及中苏论战时，道：“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是为旁证。参见《邓选》第三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

<sup>19</sup> 1964年6月8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或为此一说法的最早出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五卷358页。

<sup>20</sup> 1967年5月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1968年5月8日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等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89、161页。

污”，而是“偷”。因为大家都吃不饱，几乎没有不偷的。至于到底偷了多少，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偷多少斤粮食？”

“五百斤。”

“五百斤？告诉你，我们掌握你的材料，老实交代，到底偷了多少斤？！”

一看过不了关，被审的人也随风长，说：“一千斤。”

“回去你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交代。”

第二天又来了，说：“老实交代，到底偷了多少斤？！”那人一看还是过不了关，就说：“两千斤。”一直说到一万斤，甚至更多。总之，你想要多少斤我就报多少斤，没有什么原则，直到你满意为止，终于可以过关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偷没偷粮食，完全是诈他。有的时候还诱供，直到几个人的口径全部对上。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父道政治（paternalistic politics），“作之君，作之亲”，而且有的家长很霸道，他说什么就得是什么。然后底下人就盲目相信，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跟小孩一样。

那次下乡还有一个触动，就是发现农村依然极其的落后，简直让人想像不到。或许两千年前的情形也不过如此，比如秦朝、汉朝，因为你没法把他们的生活想得再简单了。海阳县在青岛东北两百多里，按理说是老解放区了，我们去的时候解放已经二十年，总不能归咎于“反动统治”了吧？就算在一个荒岛上从零开始，二十年的时间也应该过得去了，怎么会穷困到那种程度？任何现代化的东西都没有，没有电灯，天黑就睡觉，有的连被子也没有，就一床破棉絮。四五个小孩挤在土炕上，个个都光屁股，吃喝拉撒睡全在上面，大使用手一摸胡噜到地上，接着就去拿吃的。房子都是夯土打垒的，窗户外面就是垃圾堆。猪圈和屋子紧挨在一起，空气十分恶劣，加上室内不通风，很多人有气管炎。而且非常奇怪，乡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犯胃病，为什么呢？后来我发现，当地人一年四季几乎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吃——白薯。北京冬天卖的那种烤白薯红得流油，又甜又香又热乎，好吃极了。可是乡下的那种白薯又苦又涩，简直难以下咽。据当地的老乡说，这是日本来的品种，唯一的优点就是产量高，一亩可以达到两千斤。下来以后切片晒干，每天两顿，天天吃、月月吃，终年不断，怎么能不得胃病？

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精神方面，包括蒋介石也说过“精神胜于物质”，但我

总觉得，在这一点是过分唯心论了。毕竟人民生活穷困还是最现实的，多少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替代不了。

一起劳动的时候，我曾和几个农民聊天，问他们一年能挣多少钱？他们说，一年工分的钱差不多能买一双新的篮球鞋。这实在让人震惊，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穿很差很差的鞋，甚至有些农民根本没鞋穿。70年代下干校，有一次我去赶集，回来路上和当地的老乡聊天，也问他们一年能挣多少钱。他们的回答倒干脆：“没钱。”这回更彻底了，怎么会这样？而且，农村里的风气也并不好，比如记工分。每天记分多少都掌握在领导手里边，这里就有很大的学问了。有一种风气叫“跑分”，因为凡领导家里的人出工就多记分。所以一看见领导的家属干什么活儿，大家就跑去跟着干，无论劳动轻重，保证能多记分。

还有一点怪现象，那时候也有义务学校了，可是他们的子女大都不愿意念书。有个队长读到小学四年级，结果还蹲了三次班，可见他们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当然这是和实际利益挂钩的。所有人都凭工分吃饭，都是很原始的重体力活儿，何况“知识越多越反动”，谁也不愿意戴一顶反动的帽子，还要知识做什么？

中国的农业始终拖着社会进步的后腿，毛最初的想法是要改造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这么说，可是好像始终不成功。按道理说，社会稳定后，用上三年五载就该有基本的恢复，有个一二十年就可以建设得很不错了。可是解放都二十多年了，一直到文革结束，普遍的物质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进步，连工资都是二十年一贯，这是为什么？

选自《上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2

【口述】

## 吴忠杂忆

陈楚三、李大震整理

### 一、李讷和李敏

我到北京时接触过李讷<sup>21</sup>，她当时在解放军报社。毛主席分批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我们列队跟着主席陪同接见，每次都有李讷，原因可能就是她担任军报

<sup>21</sup> 李讷，生于1940年，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65年大学毕业；“文革”中在《解放军报》造反，曾任报社总编领导小组组长，后任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文革”后未担任领导职务。

负责人。她见到我们叫“叔叔”，不傲气；照相时大家让她站到前排，她不去，说自己是小孩，退到后面，给我印象是好的。

九大以后，据说毛主席让李讷到下面锻炼一下，不知怎么搞的，就到北京当市委书记了，这算下去锻炼吗？我想这不是毛主席的本意。

北京军区在怀柔水库搞游泳比赛，这天李讷约好下午三点到我办公室，所以我三点前回到卫戍区。她来后我提出请杨俊生同志一起参加，她同意。就一起谈。她带给我和杨政委每人一瓶酒，说她爸爸（毛主席）让她到北京市委向老同志学习，拜访老同志；她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来古文了，我说下面一句中的“老彭”是谁，考证不清楚，她说也不知道；她说自己的性格不信邪，强加的东西不接受，并说“吴叔叔，你把这把扇子送给我吧”，我说扇子已经旧了，她说没关系；杨政委说她很活跃，她说我有一个那样的母亲嘛！又说，私下我喊你吴叔叔，开会叫你吴副司令，我说随便。下楼吃饭时，很多干部已吃完饭了，她又讲鲁迅的一段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很欣赏这段话，对大家说，我就是那个牛；还围着汽车转了一圈，像牛推磨似的。她的秘书姓杨，说不要吃饭了，她也说不吃了，她来就是按主席要求拜访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李讷一直没去吴德那儿。

过了两天，吴德说李讷去看李德生、纪登奎，到那儿以后问李德生：你们是不是也是将军啊？感觉不太正常的样子；说了几句后就脱掉罩衣，里面是孙猴儿的衣服，就在那里做孙猴儿的动作，不知道这算什么拜访。吴德同志说，她在那里这样弄了一套，不是一种尊重的表现。李德生告诉总理李讷去看他，吴德告诉总理李讷去看了吴忠、杨俊生，总理在一次会上解释说，是主席让她去拜访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不明白总理为何要解释。

这时李讷还没有上班。有一次她带杨秘书到市委门口，看到市委、市革委会的牌子，骂“修正主义”“反革命”。据门口说，也骂江青，骂完了就走了。后来开会她来，看来还正常啊！但很多表现精神不正常。

我是1968年5月13号到北京，突出印象是到处大标语“炮轰聂荣臻”，落款“李敏”<sup>22</sup>。我问警卫一师李敏是谁？他们说就是毛主席的大女儿；多大了？

<sup>22</sup> 李敏，生于1936年12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小名“娇娇”。大学毕业后在国防科委工作，文革中曾造反、反对聂荣臻，后调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三十多岁；我说是不是在延安贺子珍<sup>23</sup>生的娇娇？他们说就是她；我问，她现在在哪？回答说在七机部或国防科委。

我知道，聂帅分工管国防科委，你毛主席的女儿炮轰聂荣臻干什么？给人们什么印象？好像是毛主席叫你炮轰？毛主席要炮轰会指示女儿去炮轰？这个人给我的印象不好，这件事做得不对。江青仗势欺人，在大会上说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李敏炮轰聂荣臻，我也很反感。这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也是仗势欺人。毛主席不可能指使女儿去炮轰。

有一次民族宫音乐晚会，有刘诗昆<sup>24</sup>的钢琴独奏节目，我参加了，碰到孔从周<sup>25</sup>同志，我们关系好，他把儿子孔令华<sup>26</sup>和李敏叫过来介绍，孔令华还客气，李敏爱理不理的样子，给我的印象不好。后来杨勇同志去世，遗体告别时孔从周去了，孔令华也去了，我问孔从周同志李敏情况怎样？他说，李敏现在交党费都没人收。说明国防科委、七机部对她的问题看得很重。她可能是916派的，与舒龙山<sup>27</sup>是一派，毛主席批示舒是左派，恐怕李敏是起了作用的。

李敏炮轰聂荣臻，孔从周把李敏介绍给我时她摆架子，给我的印象很不好。

毛主席病重、病危时，据了解李讷没去看过；毛主席逝世后，守灵她也没去，我们都参加守灵了，江青也守灵了，女儿为什么不去？抓“四人帮”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同志到玉泉山，我问吴德，李讷到哪去了？吴德说就在玉泉山住，每天在这儿玩，没事。江青被抓起来了，李讷也没有表现出痛苦。我想这不是正常人的情况，可能是病态。毛主席的追悼会也没参加，按道理是反常的；江青抓了，也没什么反应，我看是病态。

## 二、“四人帮”和谢静宜

<sup>23</sup> 贺子珍(1909.9—1984.4)，毛泽东第二任妻子；1937年因夫妻矛盾，负气赴苏联，1948年回国。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杭州市妇联副主任等职。

<sup>24</sup> 注5：刘诗昆，生于1939年，享誉中外的著名钢琴家。十岁即获全中国少年儿童钢琴比赛冠军；十九岁时获世界顶级“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亚军，其后他的演奏足迹遍及世界上数十个国家，蜚声世界乐坛；曾与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有过五年婚姻。

<sup>25</sup> 孔从周(1906.10—1991.6)，原为杨虎城将军部下，参与西安事变；1946年任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时率部起义。新中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sup>26</sup> 孔令华(1935—1999.12)，孔从周之子，娶毛泽东女儿李敏为妻；遇车祸后手术时去世。

<sup>27</sup> 舒龙山，生于1935年。曾为第七机械工业部230厂工人，“文革”中任该厂革委会副主任，后任中共第七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革”后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江青给我的印象。文化大革命中在一个十万人大会上讲，谭震林是个大叛徒，我在锦州四十军当军长，听了很反感，谭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来宣布？要中央决定，中央宣布，你算老几？谭震林是老资格，井冈山时期地位很高，江青这样狂妄，我和刘振华（按：当时的四十军政委）对她很不满意，认为她仗势欺人，刘振华还说，毛主席把老婆弄出来干啥呀？这对主席的威信多不好！

江青目中无人，说来可笑。有天晚上在人大会堂开会，吃晚餐，华国锋是山西人，爱喝面条，他喝面条声音太大，江青听到了就转到华国锋身边说，你吃饭声音这样大，怎么接见外宾呢？这时华国锋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即使吃饭声音不雅，也不能像大人训斥小孩那样霸道。

“四人帮”都狂妄。姚文元给江青证明傅崇碧带枪冲中央文革，说后面车上还有机关枪，怎么证明？手枪是从傅崇碧铁柜子里找出来的。张春桥，清明节晚上十二点看表，说清明节已过，可以收花圈，推翻了政治局六号收花圈的决定，一方面是张春桥狂妄，另一方面政治局的老同志太软弱了。

连下面的小家伙也不像话，上海有个叫王秀珍<sup>28</sup>的辽宁人，胖乎乎的，长得也难看，毛病很大，九大开会时毛主席出席好几次，她在主席台上，毛主席走后一散会，她马上下去把毛主席喝过的茶杯拿走，动作比谁都快，好像她对毛主席的感情比谁都深厚，一看就是假的，做作。京西宾馆开会吃饭时，她一见到肥肉就害怕，说怕吃胖了，我说不吃肥肉也照样可以胖，猪那样胖谁给它吃肥肉？她说“也是”。实际上我是挖苦她像猪一样胖，旁边有人听出来了，光笑不说话。

谢静宜原在中南海搞机要工作，觉得自己不得了，后来成了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团中央筹备组组长，狂得不得了。批邓时特别狂。抓了谢静宜后，查她的笔记本中有一段话：今天和吴忠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我想起来，是吴德主持召开一次书记会，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人到的不是特别全，丁国钰同志发言说，谁的级别、职务高，谁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多；我不赞成他的说法，半开玩笑地让他谨慎一点，工人农民没有职务就没有资产阶级法权？谢静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看执行什么路线，好像她很有把握，理解多深刻，我们都不理解。党内冒出个资产阶级，党的性质不就变了？资产阶级

<sup>28</sup> 王秀珍，生于1935年。原为辽阳市先进生产者、辽宁省劳动模范、东北地区劳动模范；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国棉三十厂工作，“文革”中成为厂文革主任；后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等职；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1月离职受审查，1982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在党内的代理人好理解，怎么资产阶级在党内？我接着发言，说历来划成分、划阶级不是按政治态度，而是按经济地位和剥削关系来确定，有的工人、贫下中农十分反动，坏透了，你能划他是资产阶级、地主吗？有的资本家、地主表现很好，改造很好，能划成工人、贫下中农吗？都不能。谢静宜的脸唰地就红了，她是按政治态度划成分的。她在本子上所谓激烈的辩论，应该就是指这次，其实是被我奚落了一顿。

批邓还未公开时，谢静宜就和团市委的几个年轻人，背着市委批邓。有一次，我在市委的办公室里，杨俊生同志打电话，说谢静宜要借卫戍区礼堂开批邓会；我说不行，这样会把卫戍区的思想搞乱，不借给她；杨俊生同志有顾虑，说机关礼堂不借，可否借西单招待所礼堂？我说也不行，并请杨俊生同志通知各下属单位一律不借，这时中央还没有批邓，她是点火的，文化大革命中卫戍区也没有开展四大，不能让她来；杨俊生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让政治部通知各下属单位一律不把礼堂借给地方开批判会。

点名批邓后，市委常委开会，吴德装病请假，我和杨政委不参加，会很冷清，谢静宜动员我们参加，希望我们捧场，我说卫戍区事情多，没时间。

### 三、“四五”事件中的《应急方案》<sup>29</sup>

1980年或1981年，中纪委来四个同志，像是要了解华国锋的问题，找我核实材料。主要是1976年的《应急方案》问题。

四人开始摆出阵势，说应急方案问题在北京找了杨俊生政委、李刚副司令和卫戍区机关的同志座谈过，后来又到大连找杨俊生政委谈了一次，现在要听我的看法。

首先问我，应急方案是不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说当然是重大问题。问：既然是重大问题，卫戍区常委开会讨论过没有？我说没讨论过。问：为什么？我说，6月27号我在北戴河，杨俊生同志在市委，吴德、倪志福同志交代了一个任务，说毛主席病重，是在毛主席病床前布置的，怕病危消息传出后会发生骚乱，因此要搞个方案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这是杨俊生同志接受的任务。杨俊生同志召集三家（公安局、工人民兵、卫戍区）拟制方案，显然是代市委拟制方案，并不是

<sup>29</sup> 本小节的标题是编者改的，原为《应急方案》。

卫戍区向中央报方案，而是北京市委上报。杨俊生打电话要我回来，并未说内容；我估计可能是毛主席病重。我于28号早晨回到北京，上午杨俊生同志叙述了接受任务的过程，三家再次一起开会讨论方案如何拟制。因为是代市委拟制向中央报的方案，卫戍区常委不开会是对的，如果开会作出决定是不对的；卫戍区常委作出决定，让北京市公安局执行，让工人民兵总指挥部执行，这样妥当吗？当然不行。杨俊生和我是分管政法的书记，召集三家一起研究、协商，制定方案，这样做是对的。这时，四人便停止了询问。

接着，四人问，方案中提到三种情况：相当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大于、小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是怎么设想的。我说是我的发言，天安门事件过去并不久，是用来做个比喻；方案不是现实的东西，是设想情况，搞想定、假定。研究、讨论的结果，按照这三种设想来拟制方案，就不能说是我吴忠的发言了，是三家的共同意见了，就不姓吴了。就算是我讲的，有什么问题？

杨勇副总长和他老婆给我一位熟悉的战友讲，说这个应急方案是个屠杀方案！毛主席病重，中央几个领导在主席病床前商量、布置这项工作，怎么成了屠杀方案？毛主席病重的消息传出，发生骚乱，要动武呢？就是大于天安门事件了，这怎么成了屠杀方案？

看来，他们找杨俊生、李刚谈话，开座谈会，都没有说清楚，说清楚了就用不着到广州来找我。说不清楚就认为你在搞鬼，吞吞吐吐。我说清楚了，从此后再不找了。

他们往坏的方面想得多，就没想到不开常委会可能是对的；只想一面，另一面想不到，不能搞研究工作。什么时候开常委会正确？如果拟制的方案市委通过了，上报中央也批准了，三家分别落实的时候，卫戍区做卫戍区范围的方案时，开常委会就正确了。公安局开公安局的常委会，民兵总指挥部开民兵总指挥部的常委会。我对这四个人建议，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片面调查，我们的教训够惨痛的了，文化大革命搞的冤假错案难道没搞调查？肯定也搞了内查外调，而且不是一次，国家花了一笔巨款，到头来是冤假错案，为什么？就是片面调查，不实事求是。我说，沈阳军区刘德才<sup>30</sup>的问题处理过重了，降级、留党

<sup>30</sup> 刘德才（1917—1986.9），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解放军师长，要塞区司令员，军长，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察看，他只是修了个宾馆（渤海饭店）；不能搞楼堂馆所，现在楼堂馆所不是比他搞的多！这个人谋私利，打仗勇敢，工作积极，家里是穷光蛋，什么都没有。1970年我去旅大参观他的人防工事，他把山都打空了，汽车在山洞里面钻来钻去。对他处分过分了。我过去敢说话，文化大革命还敢说话，现在更敢说话，两条：第一条打倒“四人帮”了，第二条我都六十多岁了，有啥不敢说的？一天天接近死亡了，死了不打也倒了。我为刘德才说了不平的话。后来刘德才的大军区副司令员恢复了，级别也恢复了，没事了。

有理要说得清才行，说不清就问题很大，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是让你有理说得清。

#### 四、公安部长李震之死<sup>31</sup>

案件发生在1973年10月21日。这是一个很大的案件，建国以来没有过，一个公安部长死因不明。周总理很重视，毛主席也很重视。

开始认为他杀的可能性大，案件侦破围绕他杀进行。破案组开始是总理直接管的，成员有组织部长、卫生部长、调查部长、中办副主任、公安部党组书记、总政副主任等；后来在紫光阁开会，总理要我牵头当组长，我说我不懂专业，事情又多，不适合当组长，叫罗青长他们搞吧，总理说还是你搞吧。

一个礼拜后，我向总理汇报侦破情况，华国锋同志在场，我说他杀的线索未发现，自杀的疑点较多。当总理不在场时，华国锋同志说，吴忠同志，你得想深一点啊！我理解他的意思，总理、主席认为他杀可能性大，我要多往这方面想。可是他杀要有证据啊！要尊重客观事实。后来总理事务多，就让华国锋同志抓，华国锋向总理汇报时我们也参加。从73年到77年抓了“四人帮”后才结案，好几年。

把于桑抓起来的原因，是发现李震尸体的位置在暖气管道沟中，发现后下去好多人，把现场踩得乱七八糟。总理说你于桑搞公安工作这么多年，怎么不懂得保护现场呢？因此对于桑产生怀疑，他们是公安部的两派，矛盾较大。刘复之<sup>32</sup>怎

<sup>31</sup> 本小节的标题是编者改的，原为“李震案件”。

<sup>32</sup> 刘复之（1917.3—2013.8），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武警部队政委、第一政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

么抓起来的，我也不懂得，可能是他海外关系多的原因，我不知道。抓于桑、刘复之，政治局开了会，要杨德中把他们抓起来交给卫戍区。卫戍区主管的是曾绍东同志。这天政治局休会，找我去了，吴德也在，总理说政治局决定于桑、刘复之、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要保护审查，我对吴德同志说，程诚与案件毫无关系，审查什么？吴德说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于桑是中央委员，抓他要主席批准，主席回电话同意政治局的决定，总理要我通知于桑、刘复之来人大会议，并说万一他发现了，车掉头就往苏联大使馆跑怎么办？要有措施；我作了安排。可想而知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一案件的想象，看得很大。可见于桑、刘复之被抓不是我吴忠告的状，我根本不知道。

继续侦查，自杀的线索越来越多、越具体，他杀的线索一条也找不到。若被人勒死后再挂上，绳索印子不能重合；若被毒死后再挂上，皮下不会出血。现场有几片安眠药，解剖发现胃中果然有，还没有完全化掉；医生分析，安眠药还不到窒息的程度他就上吊了。查卫生所，他确实要过一瓶安眠药速可眠。别人强行让他服安眠药不可能，而且现场也是李震的脚印。分析李震决心要死，服用安眠药后怕被发现抢救，又上吊；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才找到尸体。

最终结案，他杀的线索一条也没有，自杀的证据非常具体、非常充分。绳索是办公室窗帘上剪下来的，剪刀上的纤维化验结果和窗帘挂绳一致。他杀应有两个现场，但没有第二现场。所以破案组的结论是自杀。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一、二月份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有结论、有证据；自杀原因未弄清，建议破案组撤销，卷宗存档，由中办处理。华国锋批示同意破案组的报告。此后不久我就调到广州了。

为什么抓程诚？周总理有考虑，怀疑程诚与李洪枢案件有关。李洪枢案件结案后，证明于桑、刘复之、程诚任何关系都没有，才把他们放出来，于桑先放的。我和程诚谈的话，总理指示，你与李洪枢案任何关系也没有。

李震为什么自杀？我到现在不清楚，也许中央清楚。李震和我关系不错，自杀前不久和我谈过，我个人看法，他说实在不愿意当公安部长了，可提给谁听啊？给总理提，弄不好总理会误解：你嫌官小还是怎么？没办法提。我也给李震说，我实在不愿意当卫戍区司令了，也不好提；北京卫戍区，又搞政法，太累，太复杂，太伤脑筋。从李震流露的想法，我个人看有两个原因，公安部长对中央的情

况知道比较多，太为难了！李震这个人非常爱面子，历来一帆风顺，他不是想往上爬，开会都是往后缩，过去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很聪明，有才华，抗美援朝是十二军政治委员。他自杀是难死了，太为难了！另外，某种意义上对我们党失望了，有看法。

有人提到男女关系问题，李震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确有公安部的破女人，是于桑一派的，把李震说的卑鄙得很，乱搞，我们一了解不是事实，李震也不会因为这就自杀。李震对自己、对子女要求都很严格，家里破破烂烂没有什么东西。

总理在我反映案件侦破情况的报告上批了一小段话，要将几个人逮捕、拘留、传讯，一个是公安部的刘坚夫<sup>33</sup>同志，当时是局长，粉碎“四人帮”、刘传新死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再一个是五号楼的三个转业战士，李震家人说有电话让李震去五号楼开会，这三个小家伙住在五号楼，怎么一点动静也听不到？总理批示中还有好几个公安部的局级、处级干部。可是我给总理的报告中毫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也没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总理为什么这样批示？我建议不要采取这样的专政措施，谈话了解情况就可以了，专政措施伤人；总理就改了，一律改成谈话。这个批件存档，公安部也有，可以看里面都有谁的名字，他们是否被拘留、逮捕、传讯，一个也没有，都改成谈话了，他们本人未必知道。这说明总理对公安部长死因不明非常重视，采取断然措施多；也说明总理很民主，只要觉得有理，愿意采纳下面的意见。☑

【述往】

## 文革后期“小解冻”

马昌海

1975年前后，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里的一些北京下放干部陆续购买了上海最新出产的9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熟人们纷纷前往观看，厂里轰动一时。这种小屏幕国产电视机的售价为190元，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了。如果是在文革初期，恐怕是无人敢于如此张扬地消费和购置“露富”的。家境富裕的京籍青工荣氏兄弟也购买了一台，我们晚上就常常到荣家老大瑾明的单身宿舍里，挤在

<sup>33</sup> 刘坚夫，生于1917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鞍山市副市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副市长等职。

一起观看北京电视台（前央视）的节目。我们有幸欣赏到了一些音乐作品，如贺绿汀的管弦乐曲《晚会》《森吉德玛》；陈钢的小提琴曲《金色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苗岭的早晨》；小提琴协奏曲《渔家姑娘在海边》；小提琴曲《走大寨之路》《黎族代表上北京》；小提琴曲《人民公社实在好》；四重奏《萨里哈最听毛主席的话》；钢琴曲《战台风》；聂耳的《金蛇狂舞》《下山虎》；任光的民乐《彩云追月》；广东音乐《旱天雷》；柳琴曲《春到沂河》；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齐奏《奔驰在千里草原》《喜送公粮》；板胡《公社春来早》；刘德海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天山之春》令人如醉如痴；还有排箫演奏的罗马尼亚乐曲《云雀》；小舞剧《鱼水情》；舞蹈《草原女民兵》《野营路上》和《喜送粮》等。斯时正逢邓小平出山搞整顿，节目中还出现了一些外国歌曲，大家一边欣赏，一边兴奋地大叫“解冻了！解冻了！”印象很深的，是一首郭淑珍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法兰西的土地》，中间还有变调因为在语文课上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所以也大致知道“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怎么回事。后来又常去细纱车间的好友文斌和庆和家看电视，记得看过几部朝鲜等国的译制片。

厂里还放映过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群山》《风暴》《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依》《侦察英雄》《爆炸》《橡树，十万火急》《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巴布什卡历险记》；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73年译制）以及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降》《第八个是铜像》《在平凡的岗位上》等，这在当年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其中的乐曲也很快在厂里流传开来。如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南江村的妇女》《一个护士的故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中的插曲。1976年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初春》中，有一群德国兵在街边酒馆醉醺醺地高唱意大利民歌《美丽的村庄》。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氛围下，熟悉这首歌曲的原北京学生很快就浑水摸鱼，在厂里的文艺会演中推出了。如果是在文革的高潮时期，不管法西斯德国士兵唱的是什么歌，恐怕也没有人敢公开传唱。

吉他在文革时被视为不务正业的玩物。因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中的一句对白：“没想到革命者也玩吉他”，以及弹着吉他唱起的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于是就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吉他热，其弹奏方法还有西班牙与夏威夷之别。此后就看到有少数青工在弹着吉他吟唱。

当然，在“五·七”厂的青工中，特别是在原北京学生中，私下里哼唱的外国歌曲和演奏的外国乐曲就太多了。不少人学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有吹黑管的。

大约也是1975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一样，开办了英语教学节目。“五·七”厂也兴起了一股小小的“英语热”，学习者以原北京学生居多。还有的人，包括原“老五届”大学生，一直坚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教学节目，但前提是要有原版教材和一台高质量的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有人冒险按“美国之音”电台广播提供的地址写信，免费索取“英语九百句”教材，居然也顺利收到了。

1975年毛泽东发出“七二一”指示后，厂里也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由北京来的工程师和“老五届”大学生授课。同时还开办了业大，上百人热热闹闹去上课，盛况空前。业大从初中的数学开始讲起，陆续开设过不少课程；各车间的工程师也按照生产流程讲厂里各类机器设备的原理，还有棉纺织工艺学。这些课程我基本上都是听了一半就学不下去了，一是提不起兴趣，二是实在学不进去。《机械制图》到现在还记得“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大概只能画轴类和轮盘类的图纸；《金属工艺学》只记得一点铸造知识；《电工原理》仅仅记得节点电流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和回路电压定律；《晶体管电路》还记得整流与放大；《理论力学》只记得一个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的术语“转动惯量”。《材料力学》也完全听不懂。不过，棉花是怎么成为棉布的，各种棉纺织设备的基本原理，大致还是清楚的。

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起来，“小解冻”戛然而止。❏

## 【文摘】

###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严家祺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一九七七年，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文革前，科学院有许多学部，除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外，还有数理化学部、地学部、生物学部等。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

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一千七百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 早于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天，汪东兴代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文革还只是在报刊上进行大批判，批《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批三家村，全国上下，还没有一个单位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实际上，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学部贴出的。一九六六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

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两天，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了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大楼墙内墙外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是从全国报刊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



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被捕后被国民党活埋了。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的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 哲学所文革的通宵会议

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北京郊区农村“滚泥巴”。毛泽东，也可能是康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我们研究组（不叫“研究室”）的十多个人，就在北京郊区的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滚泥巴”。我们“滚泥巴”的具体做法是在徐辛庄公社里盖三间像大庆油田那样的“干打垒”房子。五月三十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全体“滚泥巴”的人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我们点亮了一千瓦的电灯，通宵达旦干活，油漆三间即将造好的房子的门窗。晚上油漆是看不清楚的，天亮后，我们发现，门窗上的油漆厚薄不均，十分难看。房子造好，没有住一天，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最早的文革，首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革”本单位当权派的“命”。哲学所所长是潘梓年，陈冷是副所长。这个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在哲学所参加了全所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六月一日天亮。当时，哲学所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陈冷。近二十小时的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冷如何不让大家贴大字报，这就被视为对抗文化大革命，为陈冷辩护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叫姓邹的研究人员揭发党小组长于良华紧跟陈冷，劝说人不要贴大字报。于良华对邹说了一些劝说的

话，于良华不承认。邹就拿出了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记录，这使于良华哑口无言。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暗地里记录别人谈话、并作为证据，这使我非常震惊。整个晚上会议中，大家没有睡意，高潮迭起，到早晨，陈冷就被“斗”垮了，哲学所的全部权力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和吴传启手中。

我之所以记住近五十年前的具体时间，主要是那天早晨七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冷也同大家一起听广播。陈冷在来哲学所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从六月一日起，陈冷与支持他的几个人在一起，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楼走廊和厕所打扫卫生。

### 吉祥剧院六四夺权大会

在《人民日报》上大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时，林聿时、吴传启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针对的是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写的《青春漫语》。批杨述后，学部大权仍然掌握在党委书记关山复手里。从六月一日林聿时、吴传启夺取了哲学所大权后，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学部的大权。学部大院到处贴满了批判杨述的大字报。六月四日，学部在王府井吉祥剧院召开批判《青春漫语》大会，会议在几个人发言后，忽然有人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关山复、刘导生对杨述是“假批判、真包庇”，台下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的影响下，支持关山复的人被视为“保皇派”。六四大会后几天下来，关山复、杨述和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张友渔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剥夺了全部权力。

六月四日后，学部建立了文革小组，领导全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什么红卫兵，学部还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派。在六月、七月，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起来按哲学所的模式造反，批斗当权派、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学部是聚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权威，除了个别人如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副所长金岳霖外，几乎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拿文学所来说，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研究室主任唐弢、朱寨、余冠英、蔡仪、贾芝、《文学遗产》的陈翔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所批斗大会上，何其芳、毛星的头上被套上了厕所里的字纸篓，

在所里被批斗之后，这些人头上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的黑牌子，由所长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钱钟书戴的是古钱币式的纸帽子。学部大院有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新建设》杂志社和学部机关等单位，到六月下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有一百多人，他们多次站在一号楼后、戴着高帽子接受训话、批斗，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还能认出。

### 戚本禹李讷来到了学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有中联部的王瑞祺、时代。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林聿时、吴传启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当时学部有四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是在学部大院的历史所、二是在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三是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还有一个世界历史所。当学部许多研究所的领导垮台后，历史所却没有变化。六月中旬，历史所两个年轻人王恩宇、傅崇兰起来反对历史所负责党和行政的领导人酆家驹，这个酆家驹就是今天中国著名演员海青的舅舅。我曾经在一次食堂召开的历史所大会上发言表示支持王恩宇、傅崇兰。因为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恩宇、傅崇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我在哲学所既没有受到批评，也没有人赞扬，因为我无足轻重。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学部，与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传达陈伯达指示。我到历史所礼堂参加历史所全体大会。我选择第一排边上就座，看到礼堂讲台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的巨幅画像。我在哲学所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像挂在一起，所以，我盯着林彪的像仔细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挑起的。对他歌颂毛泽东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格格不入。我想，要“造反”，就应当把林彪的像从讲台墙上摘下来，但我没有勇气。

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礼堂讲话传达陈伯达指示说，历史所领导酆家驹立即停职反省，王恩宇、傅崇兰获得释放，切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所副所长尹

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自此，王恩宇、傅崇兰与林聿时、吴传启一样，成了学部公认的革命左派。王恩宇成了学部文革和联队领导人。我一点也没有为王恩宇、傅崇兰感到高兴，回到哲学所，我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了。

跨出反对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一步

七月十八日，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结果，使林聿时、吴传启成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完全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大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当天，《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彭定炎写大字报起来反对林聿时、吴传启，我终于跨出了大胆的一步，我加入了彭定炎的行列，成为最早反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八个人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获得了行动的充分自由，我不再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和我所在的“研究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也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我们八个人除了彭定炎和我外，还有赵忠良、郭官义、付乐安、李甦、李敏生、张林珠。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作为哲学所的“少数派”，我们也有一间办公室。由于我们八个人，都没有当“头”的想法和能力，大家在一起，会开不起来，总是聊天，连学毛选一套都免除了。上班一会儿，有家的回家，我经常步行到东单、王府井闲逛。

反吴传启震动了整个学部。学部政治部文革小组的宿炳辰、毕求自，法学研究所文革小组的叶维钧、高崇福，带动他们单位起来“造反”，把目标指向吴传启。历史所王恩宇、傅崇兰此时已是学部文革“左派”，支持林聿时、吴传启。从此学部开始形成两大派。我们的“红旗战斗小组”也增加了几个人，其中有徐崇温、柳树滋、杨少春。

八月中旬，在学部大院临时建起来的“大席蓬”。八月二十六日，在“大席蓬”有几百人参加的一次辩论大会上，我上台讲话，被哲学所的张浩揪着头发拉下台，并轻微受伤。我们一派的人，立即把我送到同仁医院，医生还开了证明，这成了“八·二六事件”。当时，哲学所几个人写了一张揭露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贴满了一号楼后面平房的一面墙。最重要的错误言论是，“怎么能说打乒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输了怎么办？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的

失败？”

就在我被打的第二天，在林、吴的支持下，学部成立了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队长是邹永图。反吴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成立了“学部红卫兵总队”，队长是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戴念祖，文革中，他改名为戴念东。

### 陶铸的四点指示

文革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在学部大院的“大席蓬”内召开了七天辩论大会，“联队”“总队”两大派一对一发言。哲学所的徐崇温一天中作了八小时发言，就像吴传启列举杨述“三反”言论一样，把吴传启文章中的言论一一列举，说吴传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大辩论造成了学部文革更大的分裂，两派如同仇敌。

在文革前，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在文革初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吴传启当然要小心翼翼地不涉及关锋。“总队”从吴传启的文章中摘录了几百句话，抓住吴传启曾经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之类的话，断言吴传启是“三反分子”。“联队”则坚持认为，吴传启与关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吴传启，实质上“老保翻天”，打击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的“左派”。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通过关锋，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九月二十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消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十二月十九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消息的吴传启、林聿时，指使“红卫兵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而我们一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不辩文革风向，凭感觉办事，为了与“红卫兵联队”唱反调，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

语和大字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后来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哲学所周景芳联名五十余人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学部其他研究所也贴出反对陶铸的大字报。在吴传启、林聿时策划下，学部红卫兵联队，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联合成立了“首都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

我们一派的人，远比“红卫兵联队”人少，大多数人是行政人员，不会写文章，写大字报也不容易。我学数学物理出身，当时也写不了文章。明明陶铸在九月二十日作出了保吴传启的四点指示，在我们一派贴了“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后，自认理亏，而“红卫兵联队”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因为四点指示中有一点是“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这表明，陶铸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 伊林·涤西和联动的启示

我在大学时代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专业下有“专门组”，我进入的“专门组”是基本粒子物理学。我之所以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放弃数学物理，而报考哲学研究生，就是为了用科学来分析研究中国政治。我强烈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政治也不例外。看到文革中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无人管我是否上班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从建国门步行到王府井、天安门、西单，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〇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为“六〇年前”和“六〇年后”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 00 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起点。我自然科学出身，过去怎么会去注意什么“左倾右倾”和“专制制度”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这时开始知道，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几天后，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苏联历史。在这时，我认真地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当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就在北京开始风传陶铸要倒台的第二天，哲学所文革小组派人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我到林聿时办公室大吵大闹，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随着陶铸垮台，我们一派一些人被看作是“反中央文革”，受到批判，“红旗战斗小组”和学部所有反吴传启的组织被勒令解散，“总队”土崩瓦解。

## 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联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后来，愈来愈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联，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五十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联的文件，自发性的串联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学部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学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告，到这时学部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们一派因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联。当时，乘火车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翻越围墙的行动，我也记住了这一天的日期。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椅子靠背的木板上和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越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好容易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陞，他与我属于“敌对派系”。陈一陞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我在广州只到越秀公园看了看，就在街道上东逛西逛，搜集传单、小报和各种印刷品，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临到长沙，我突然决定下车。随便找到湖南省机械局大串联接待处住了下来。我没有地图，对长沙也没有概念，沿街步行，四处流浪。当我在公园里休息时，我拿出钱包数钱。回到湖南省机械局，发现钱包、工作证、粮票全都没有了。我向湖南省机械局接待处，讲明情况，借了钱和粮票，留下了借条，回到了北京。我的借条上留的是真实姓名。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就从邮局寄还了钱。

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被人从建国门外宿舍叫到哲学所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问题。在前排的是我原来同一派的几个同事，我记得有打字员杨少春，她对我做鬼脸。我就讲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围墙、在广州遇见陈一陞、在长沙借钱的经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机季连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笔把我的脸全部涂黑。我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停止了狂笑。当时我感到文化革命是一场幻觉，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标就



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季连亭。我毫不计较的做法，使季连亭对我特别友好。多年前，听说他已去世，现在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也算是纪念。

我到过广州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大串联。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前后，到广州开会，参加了广州市长朱森林的欢迎宴会，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会厅的地毯比我见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摇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经广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联也是逃亡，时间不过十天，第三次的逃亡已历时二十七年，至今没有结束。

### 学部文革三大派的形成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反吴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一次在东单邮局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召开的全学部批斗大会上，我们一派的头头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高崇福等十多人登台接受批斗，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学部文革只有一派，就是林聿时、吴传启和红卫兵联队。学部联队参与了许多北京和全国性的文革活动，“批陶”“反击二月逆流”，创办了《进军报》。林聿时、吴传启推荐《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周景芳到北京市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联队十多个人在周景芳手下分掌北京市的许多部门，包括掌管《北京日报》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至四月，当时总队已经垮了，学部成了联队的一统天下，但傅崇兰开始另起炉灶，联合近代史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宜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成立了“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决心与林聿时、吴传启对着干。吴敬琏当年就是“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创建人之一和专案组组长。三十年后，“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这些创建人都成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宗教等领域的专家或权威。

潘梓年是学部副主任、哲学所所长，他是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当时已年迈，没有参加运动，由于他受到林聿时、吴传启保护，大批部为了与林聿时、吴传启划清界限，就竭力打击他，学部大院里贴满了《揪出反共老手潘梓年》之类的大字报。潘梓年是《新华日报》创建人，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文革学部

三大派的斗争中，他在七十四岁的高龄，被送往江苏太湖的一个小岛上躲藏，结果被抓获，没有任何罪状就关进了监狱，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在狱中病逝。

在我被批斗后，没有人管我，联队的人也不要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我仍然在北京市内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向一位研究美学的、名叫郭拓的人不断借书看。郭拓有几百本内部发行的书，从这时开始，我才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开始读《世界通史》《第三帝国兴亡》《新阶级》《赫鲁晓夫言论集》和几十本“灰皮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后，发生了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事件。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被隔离审查。几天之内，学部形势大变，红卫兵总队复活了，在学部一号楼有了连通的大办公室。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至今没有出版过一部《学部文革史》。当年在学部的人现在都进入老年，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外国文学所工作，现年一百〇五岁。我写学部文革简史，学部几派与北京天派地派的联系，没有写入。学部一些研究所发生的大事，如民族所洪涛的“一·一五”统战部档案事件，近代史所沈元事件，潘梓年的所谓“叛徒”问题，清查五·一六的一些个人专案，当时道听途说，现在许多都模糊不清了。这里就没有写入，相反，这部《简史》中加进了我本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严格地说，这一简史，只是在学部文革中从个人角度撰写的、不完整的历史，加上个人当时的感受，也许有助于减少叙述的沉重。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人写这一历史，取名《简史》，也许可以引发一些过去的同事，与我一样，奋笔疾书，共同拼凑出五十年前学部文革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一千七百人，除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派”外，分为三大派——联队、总队和“大批部”。除了这三大组织外，也有一些不被人重视的小组织，如李肇星的同学与好友、外国文学所郑土生，为了捍卫“红太阳”，成立了一个“卫三红”组织，当年我多次见到他拖着长长的大字报一人去张贴。他刚刚贴好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写上“畏三红”三个大字。郑土生充

满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文革中他全心全意捍卫“红太阳”，说他“畏三红”，真是冤枉了他。

林聿时、吴传启是学部、也是全中国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学部三大派在对林聿时、吴传启和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的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不过，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分歧没有多大意义，每一派都是毛泽东操纵下、有局部自主性的傀儡，毛泽东还利用这种自主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群众专政”。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成了掌握无限权力的帝王，他的权力远超过秦始皇、朱元璋。

学部红卫兵中没有学生，除了个别年轻的工人外，其余的都是中青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岁。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什么红卫兵，但按当时派别倾向来分，往往说自己属于红卫兵联队、总队或“大批部”。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人，和一些不投入运动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像当年三十多岁的李泽厚，被人看不起，大多数时间属于逍遥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联队瓦解后，总队成了学部最大的组织，但戚本禹支持的大批部依然存在，许多联队成员加入了大批部。一九六八年二月，戚本禹倒台，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头头傅崇兰也被关了起来，大批部随之土崩瓦解。红卫兵总队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

陶铸的四点指示、陶铸的垮台、一九六七年九月关锋下台、一九六八年戚本禹下台，每一次大变化，都引起学部文革中一些人“站队”的变动。凡是紧跟“中央”走的人，总要不停地“站队”。陶铸的四点指示一下达，一些人就从“反吴”变为“保吴”。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突然垮台。从“反吴”变为“保吴”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一些人今天站在这一派，明天站到另一派，后天发觉又错了。所以，学部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 文革历史资料的搜集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

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要写一部《文革史》谈何容易。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与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人就合写了一本记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书——《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终于在一九八六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书的主要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社科院医务室医生高皋，她在一九七九年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后时间写这本书，我参与了修改和增补资料工作，书的部分原始资料是我在文革中搜集起来的。高皋在写《文革十年史》时，我则在写《首脑论》一书。

我特别注意搜集反对文革的资料。当时如果自己在笔记本中摘抄别人反对或攻击文革的话，如果被同事发现，就会有麻烦。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铅印的资料，其中附着反对或攻击文革的原文，一个人保存这些资料就没有任何危险。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开始，我搜集到《伊林·涤西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有关李洪山、易振亚、北京航空学院批中央文革、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大字报、发言和讲话油印稿、谭力夫讲稿、遇罗克的《出身论》《四一四思潮必胜》、湖南“省无联”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等资料。我搜集了许多遇罗克资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借去，说是给遇罗克妹妹看，当时没有复印机，这些资料从此就借而拒还，遗憾的是，有关遇罗克的情况就没有更多写进《文革十年史》。

学部和其他单位油印的首长讲话和大字报选编，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后，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是小报、传单发行场所，北京许多单位在这里散发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多种版本，只有少数很厚的《资料汇编》收几分至一毛钱。

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学所办公室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材料、书籍堆在书架上。徐懋庸是哲学所研究员，平时见他很少说话，当我在办公室中

读到《徐懋庸右派言论汇集》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言论比所有文革中的所有黑帮还要厉害，我愈读愈觉得他说得对。这使我感到，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还读到许多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言论集》《托洛茨基言论集》和考茨基、卢森堡著作。这使过去只懂自然科学的我大开眼界，使我决心为弄清文革和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 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后，随着王力、关锋垮台、红卫兵联队瓦解，红卫兵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分掌学部文革大权。总队与北京市许多学校和单位互相交换资料，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与外国文学所邵明瑞在学部创办了一份《长城报》，半个月到一个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总队的资料和报道总队的消息，《长城报》这时也收到许多外单位的交换资料，这样，我就不需要到街头上搜集文革资料了。我的编辑方针是，《长城报》集中批判王力、关锋和林聿时、吴传启，办到第四期，我担心这样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反革命”，为此离开了《长城报》。《长城报》由邵明瑞主编，而我直接与外单位一些交换站的人联系，以取得文革资料。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泽东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时，学部联队正在瓦解中，学部就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联队和后来的大批部的主要头头，差不多都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大小会的批斗。大批部成员孟祥才回忆说：“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关戚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学部实际上没有五·一六组织，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胡耀邦翻了文革中的除了五·一六以外的所有“冤假错案”。现在，五·一六案仍然没有翻过来。

我对五·一六的了解比学部所有人的了解多得多。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国家经委大楼有一个文革资料交换站，我常去交换资料，认识了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一些朋友。因为学部多派之间争夺不息，学部和哲学所没有任何人管我做什么。有一段时期，我独自一人住在哪里，帮助交换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资料。我还常到北京站附近农口一个单位的资料交换站去。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十份“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后面的署名“首都红卫兵5·16兵团”中的“1”字都画成一个“火炬”。在学部和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我确信，除了张建旗那个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学部和全国的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后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实现了他清除刘少奇势力后，对文革初期按毛泽东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393—401页《清查所谓“五·一六”》，香港潮流出版社，1990年）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我在文革高潮中的自由就结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学部办公室，每天听军号起床，每天都要学毛泽东著作、早请示晚汇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五月初，我又想办法以取得摆脱开会的某种自由，我向军宣队提出编辑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战争与革命》语录，因为我属于学部总队，我的提议很快就得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批准，在外国文学所大楼里，宣传队专门为我领导的“战争与革命语录组”腾出了两间办公室，由我负责从各研究所挑人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摘录和编辑，我挑选了五、六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历史所所长的林甘泉。我们办公室里有全套马恩列斯著作和毛选、世界史、战争史方面的多种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史，当时，我读到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门上贴的也是大字报时，我豁然开朗，觉得文革中的现象也是可以看清的。我把这一看法写进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们凭借《圣经》来反对教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凭借《语录》来攻击党政机构。”“宗教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拉向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我的世界史知识正是在这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

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学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每天几次从我们语录组办公室到学部大院四处散步，除了休息时间外，学部大院的人都在学习毛选或批斗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动。在每天上班后不久的、宁静的学部大院中，我听到的是楼房办公室里传出的语录声、慷慨激昂的发言声和军宣队的训话声，我独自一人慢慢散步，庆幸自己有不受束缚的时光，因为，在全学部范围内，也许只有我领导的小小语录编辑组内没有学毛选等形式，也没有任何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语录编好后，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单位了。我找来了学部《新建设》杂志的郝明和外国文学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语录联系印刷和发行工作，我们这时就更自由自在，游离于学部激烈的清查运动外，直到一九七〇年夏天才下干校，才结束了这种自由自在的小环境。

### 信阳明港五七干校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学部三大派独立活动的时代宣告结束，而大多数人仍然认同自己的派别。学部全体人员，除了金岳霖个别几个人外，所有老干部、老专家都集中在办公室里，睡在垫着草席的水泥地上。这时，研究室改编为连、排、班，每天听军号声而起身，集中出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思甜饭，进行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成了清查的对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按照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借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统统被赶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贺麟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学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这是杨绛《干校六记》中的话。杨绛说的干校，就是学部在河南息县和信阳明港的五七干校。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的一片低洼的荒地中，开始时，我们住在农民腾出的空房中，少则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住在一起，有的全家到干校的，一家住一户农民家。一个研究所的人分散在几个村庄中。晴天，我们步行七、八里路到地里劳动，下雨天，大家在床边学习毛选和开会。学部到干校的人很多，分散在息县大大小小许多村庄中，

干校的总部设在东岳公社。

河南农村的茅屋土房和一望无际的原野充满了中原地区的田园风光，然而，一到下雨，沿着池塘边的泥泞小道，还不得不走到食堂吃饭。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就是晴天，常常传出有一些老研究员傍晚从田间回家，漆黑一团，走错了路，跑到邻村去的事。文学所的红学家俞平伯全家到干校，从北京带了许多箱煤球，到集市买虾、买高粱秆，也成为当时干校的话题。俞平伯在集市上买青虾时，询问农民多少钱一只。当地孩子知道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后，就跑到他家门口大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则拿北京带来的糖果解围。俞平伯从集市买的有甜味的高粱秆插在家门口做篱笆，也被附近小孩毫不留情地一一拔光吃光。

在学部，许多闻名全国的专家，受到批斗，但在干校，多少还受到同事之间出于同情心的照顾，在菜园、厨房里工作就算比较轻松。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杨一之，受照顾让他养鸡，最后剩了一只，“杨一之”就成了“养一只”。而年轻人下地劳动，毫不轻松。不久，干校开始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盖房子。这样，所有年轻人就被分配做砖坯、烧石灰、做木工、瓦工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学部干校几百人就盖好了许多排平房，我们就从农民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房子中居住。

学部干校居住分散，需要从外单位调进几位医生。我妻子高皋在贵州毕节县清水铺医院当医生。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在一天从农田到住地的食堂来回走了四趟三十里路后，在傍晚又步行了十多里，来到设在东岳公社的干校总部，见到了军宣队的一位副政委李志民，向他要求调动我妻子来学部干校。当我从东岳公社回到村子时，已近深夜十二时了。而有幸的是，贵州省毕节县的一位领导人是文学所朱寨的哥哥。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努力。我妻子终于调到了学部干校。

一九七一年早春，房子盖好不久，学部干校由息县迁往明港解放军的营房。



原因是，在这之前，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和《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明港，不再劳动，而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解放军营房很大，每一栋连通的大房子可以住百余人。几乎天天开会，听解放军宣传队（军宣队）训话。不开会时，大家坐在床边的马扎上看书。规定要读毛选，但许多人在毛选下放一本其他书。李泽厚看康德著作，当时就被发现，幸而没有带来多大麻烦。我常常与一些老专家在营房外的马路上散步。温锡增是希腊哲学专家，他一次又一次与我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部，大字报上揭发林聿时提倡“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一九六七年我编辑《长城报》时，请文学所刘士杰为这“三原则”写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长城报》第二期上。在明港干校，有一次，我与温锡增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温锡增说，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有类似的说法。在当时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大环境中，我听温锡增讲话，感到万分惊讶。在这时，我还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政治还有“学说史”，不知道政治学还是一门学科。在干校与温锡增谈话，是我后来决心研究政治学的开端。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得非常激烈，明港干校因清查运动就有几个人自杀，自杀后草草埋葬，第二天一早，尸体的衣服就被当地老乡剥下拿走。语言研究所有一人说“学部没有五·一六”，就受到猛烈批判。与我同一研究所的周景芳因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而被捕，他的妻子宣燕音也在哲学所。宣燕音独自一人在明港的池塘边想自杀被人发现。当我听到这样消息时，对政治的残酷感同身受。总的来说，在军宣队的压力下，学部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积极投入运动，许多人都是应付和消极的，对被整的人用各种细微的方式表示同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杨绛不是五·一六分子，但这话也适用于干校期间的运动。所以，杨绛说：“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地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在明港的清查运动进行了不到半年，因林彪九·一三事件而有所缓和。一九

七一年九月下旬，老革命出身而研究美学的郭拓，对我说，中央出了很大的大事，不得了啊！他要我猜，我说，很大的大事只能是林彪出问题了。他并不感到我这么说有什么惊奇。郭拓的思想早就越出干校的清查运动，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范围。当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记要》说毛泽东是秦始皇时，我已确信，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帝国。这进一步增强了我放弃哲学，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四月，学部干校撤销，全体人员回到了北京。在我们回到北京后不久，学部在息县建造的上百间房子，因为地势低洼，又无人居住，被周围的农民自发自动地全部拆光了。也许在一个被贫穷包围的大环境中，一个孤立的良好建筑和设施，如果没有新的动力支撑它，世界上总是存在一种“均一化”力量，使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七干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头脑中经常还有种种改造人类社会的空想出现。他一个批示，就要求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它。解放军总后勤部写了一篇《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后，大笔一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称作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了打仗外，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要求工人、农民、学生都这样，不过，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了“文化革命”四个字，九天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接着，造反、夺权、红卫兵、红海洋、文斗、武斗遍及全国，毛泽东也不提自己的五七指示。各地各单位的两大派、三大派的斗争，使毛泽东觉得失去控制。为此，毛泽东用军管或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的办法来稳住局面。五七干校通常由军宣队带领机关干部到农村办的名为学校的农场。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所属的单位，就创办了一百〇六所五七干校，把十四万名干部和小部分人的家属送到了农村。到五七干校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时候，毛泽东改造社会的空想就

成了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残文化的“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场个人崇拜、强化皇权和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大灾难。

一九七二年春，全学部下放干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这时已经搜集不到街头文革资料了，但有仍不断有复写的和油印资料在小范围流传，如一些手抄小说、批林批孔资料、李一哲大字报。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又有大量的文革资料出现。我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凭着长安街上的灯光，在王府井口和东单邮局一带抄写大字报和诗词。《告别》那首诗，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点钟、在天安门清场前半个小时在纪念碑上抄下来的，写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册第八一三页中。


当学部所有人都从明港回到北京后，军宣队仍然控制着学部。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各所还继续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回北京后，学部的活动都以各研究所为单位，没有文革初期那样的全学部事件了，在这一《简史》中，不再多谈，这里从简从略。这篇文章是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十周年的今天一天中，利用过去已写好的、分散的文字，加工而成的。写得太长了，读者也累了。

## 五十年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文革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认定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了弥补文革初期的过激做法，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重新让邓小平主政。毛泽东死后，华国锋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结束了十年文革。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因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掌握了最高权力。接着，否定文革，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

文革五十年后的中国，沿着邓小平的道路前进，中国已经成了不同于现代欧美国家的、受马克思谴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程度比今天欧美国家严重，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没有民主法治，民众的权利不受保障。为争夺最高权力，依然与文革时代一样残酷无情。毛泽东“九大”确定的“皇位继承人”林彪，居然在“九大”两年后就逃离中国、死于非命。而毛泽东的遗孀被判重刑，自杀身亡。邓小平上台，废除了两位他亲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晚年的“天安门事件”使邓小平重新掌权，而面对同样性质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

竟然采取了远比毛泽东晚年更残暴的镇压手段，动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抗议的学生和民众。胡锦涛登上皇位，大权旁落，江泽民像“太上皇”一样操纵朝廷。周永康、令计划的贪赃枉法超出和珅百倍。就是访民层出不穷，本身也是“王朝政治现象”，地方总管，也集中了行政司法大权，各霸一方。访民北京告状与层出不穷的街头抗议，不过是疏解民怨的两种不同方式。

学部文革从吴传启等贴大字报反对杨述开始。后来。杨述也到了学部在河南的干校，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的六年中，杨述成了一个真正的访民。韦君宜说：“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 就是这样的一个“忠于党”的杨述，到“四人帮”倒台后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学部已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述已经得了脑血栓，社会科学院给他的结论是“维持原有结论。”

博谈网 2019-01-20 08:34 原载 华夏文摘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